（法）安娜·埃诺 著
怀宇 译

符号学简史

FUHAOXUE JIANSHI

FUHAOXUE JIANSHI

简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美术设计部
电脑工作室制作

责任编辑：高　为
封面设计：王书朋

FUHAOXUE
JIANSHI

ISBN 7-5306-4103-4
9 787530 641033 >

ISBN7-5306-4103-4
G·597 定价：12.00元

（法）安娜·埃诺　著
怀宇　译

符号学简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学简史/(法)埃诺著．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306-4103-4

Ⅰ．符… Ⅱ．①埃…②怀… Ⅲ．符号学—历史
Ⅳ．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48 号

Histoire de la sémiotique

Anne HÉNAULT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2-2004-169 号

本书的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特此致谢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107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00 元

译　　序

这本《符号学简史》，介绍的是法国符号学研究，尤其是“巴黎符号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译者愿意借这本简史的出版，扼要地介绍一下符号学在法国的研究状况，以有助于读者对书中相关内容的理解。

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20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这当中，语言学、人类学和现象学是其三个主要的渊源。

1、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65)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学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

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关于口语性故事的表达与内容的划分并进而为每一个方面区分出实体与形式的主张,为从科学理论上确立内容的形式描述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国语言学家邦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2、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马塞·莫斯(1872—1950)是这种研究的开拓者,他 1925 年出版的《论赠品,古代交换形式》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列维-斯特劳斯(1908—)在 1950 年发表的《莫斯著述导论》一文中指出,莫斯的研究是“一种超越经验观察并达到深层真实的努力”,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过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迪梅齐(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显然,这种原理,与符号学在话语中的研究极为相似。罗兰·巴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社会神话研究和继而进行的叙事文的结构

研究，使我们对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写到："世界范围内的叙事文就太多了"（《叙事文的结构分析导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于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因此，在方法论方面，人们经常把符号学与结构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3、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signification）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格雷玛斯曾多次引用这种表达方式，例如"显现的风帆"（《论意义》，1970，100）、"显现的银幕"（《论不完善性》，1987，78）等。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相反，它远离哲学上的聚合关系，而被明确地定义为话语意指的一种描述性理论：当它谈论存在的时候，在语法上就是指一个状态谓语，而不带任何本体论考虑。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洛－蓬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他们术语中的"相像性"（semblance），可以说就是叙事作品中的

外在形象性(figurativité)。甚至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两门学科的研究界限眼下已经模糊。

二

由于汉语中的“符号学”称谓在法语中对应于两个术语:sémiologie 与 sémiotique,所以,有关符号学的定义和理论,应该分别根据在这两个名称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来阐述。应该说,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 sémiologie 早于 sémiotique。只是在较后的一段时间里后者使用较多,所以国际符号学学会成立时(1969 年)取用了 sémiotique 一词。但是,从 70 年代开始,由于使用 sémiotique 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sé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俄裔美籍语言学家雅格布森(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 - 斯特劳斯、迪梅齐、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 sémiologie 所确定的定义(例如 Prieto[普里托]和 Mounin[穆南]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gie 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

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 semiotics，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 sémiologie 没有区别。现代法国的 sémiotique 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　）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进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

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

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它的基本表述是：如果意指S在其最初被理解的平面上就像是一个语义轴，那么，它就与—S相对立，—S在此被看成是S项的矛盾项。如果我们同意语义轴S(内容的实体)在内容的形式平面上分节为两个相反的义子：S1←→S2，那么，这两个分别考虑的义子就会有它们的矛盾项的存在：—S1←→—S2。于是，意指的基本结构就可以表现为一个矩形，其中，S1与S2、—S2与—S1是两组对立关系，S1与—S1、S2与—S2是两组矛盾关系，而S1与—S2、S2与—S1是两组蕴涵关系。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

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

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

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 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 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 sémiologie 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 sémiologie 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近来的 sémiologie 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 sémiotique 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三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它有别于美国学界进行的综合研究：在美国，虽然有着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皮尔士的巨大影响，以及有着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所在地这样的优势，但美国的符号学研究未能形成比较统一的流派，因此也就很难像法国符号学研究特别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有那么大的影响；它也有别于意大利的符号学研究：意大利早期的符号学研究受到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基础》的推动，随后形成了以语用学和通讯理论为基础的行为主义研究方向；它也有别于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德国的符号学研究分前东德部分和前西德部分，前东德部分基

本上与前苏联的研究一致，前西德部分的研究则以莫里斯的理论为基础，又融入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它还有别于前苏联的符号学研究：前苏联自俄国时代开始就具有形式主义的研究传统，普洛普对于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后来对巴黎符号学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形式主义研究几经周折于前苏联得到认可之后，便有了劳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巴赫金的诗学理论。

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后，李幼蒸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2)一书为我们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概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领域的最高认识水平。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但似乎还未形成较大的声势。译者选译这本《符号学简史》，目的在于为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参照。

2004 年 11 月

目　录

绪　论

1、1967 年,《社会科学通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杂志上①开设了一个专栏,面向当时开始形成的各种潮流的"符号学研究"。就在上一年,罗曼·雅格布森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波兰的卡齐米日市(Kazimierz)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积极主张创立"国际符号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从 1969 年开始,"符号学"专栏在《社会科学通讯》杂志上消失了,而是单独变成了一份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符号学》(*Semiotica*),并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该杂志成了符号学哲学②的一个论坛,来自全世界的相关思考均可以在上面发表。相反,这份新的杂志却几乎不给符号学理论以任何位置,尽管这种理论在索绪尔于巴黎和日内瓦、库特奈(Courtenay)和克鲁斯杰夫斯基(Kruszewski)于俄国所进行的语

---

① 该杂志由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sociales)与高等应用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联合出版。

②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埃柯(Umberto Eco)对于其几项主题进行的简要阐述而尤其是《符号》(*Le Signe*)一书(Labor 出版社,Bruxelles,1988,P. 151—206)来想像这种符号学哲学。

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后来的延续之中，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积累过程。

这种几乎是排斥的态度，给受符号—语言学启发的符号学理论此后（至今还是如此）在大范围内的传播造成了明显的困难。毫无疑问，必须说明一下这种情况。这么一来，人们便进入了符号学的一种历史的细节之中，这种历史部分地与本世纪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混合在一起，但人们又几乎要丢掉一系列源自符号学的另一种历史即符号—语言学理论之历史的概念探索和重大发现，而这种符号—语言学理论的历史正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感兴趣的。

2、搞出一部符号学理论的概念历史，是不是有点过早呢？即便设想 1966 年卡齐米日研讨会的决定仅仅是为此前早已真正进行了几十年（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的一种研究潮流提供了更多的国际前景，并且这种研究因此也已经开始载入了历史的进程之中，但是，那些年的分散性探索，作为初露端倪的一门脆弱的知识，值得大书特书吗？对于有关意指各种形式的尚难于做出的表述之真实价值发表看法，是不是过早呢？格雷玛斯和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成果，作为符号学理论最为得到发展的内容，也并不激励人们急于去做历史性的总结，因为这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理论也经常放弃自己的主张。1983 年出版的《论意义之二》，难道不就是想否定 1970 年出版的另一部《论意义》吗？作者在绪论结尾处这样写道：“某些工具性概念由于穷尽了它们的启发性价值，接着出现的情况，就好像是这样的：一种设想，例如建构可以创立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确定新的符号学对象的一种符号学方式性句法，在十年的集体努力之后，就已经准

备被取而代之了。只要是出现了一种扩充危机或是一种决定性的返回,符号学的一种新面孔就一点一点地出现了。"

1992 年 2 月,格雷玛斯的去世曾经使这种理论上的探索极为神秘地停止了一段时间,这一方面使关注符号学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有了困难,另一方面从此时开始也使人们重新回顾这种探索的过去、其前人或其先行者,以试图(如果不说是建立符号学历史的话)制定一种其理论建立的历史分期。这样来审视格雷玛斯及其学生们的著述,它们便进入了自索绪尔 1879 年发表《论欧洲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一百多年以来出现的整个发展进程之中了。

3、我们曾经认为,即便我们不希望深入到这些具有完全的不可预见性、同时又迫切需要真正的智力突破的思想事件之中,我们还是至少能够尽力来讲述一下(将个人生平与有关观念和派别的历史混同介绍)那些曾经改变了人们对于意指现象之认识的重大操作性概念得以形成与建立起联系的方式。我们尤其详细地介绍了索绪尔的智力历程。尽管这位学者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与符号学的关系并非可以直接地看到。为什么要闲扯一些与符号学理论化的关键历史无关的内容呢?讲述为其同辈人所不知或为历史所阻碍的这位天才之痛苦,有什么用呢?在我们看来,在这种全新的思想出现的情况里,应该采取将纯粹的概念考虑与某些逸闻不予分离的做法,因为曾经热情地伴随着理性发现的启迪活动和价值化过程就有意表露在这些逸闻之中。同样,我们曾经试图(借助于某些资料的准确性,几乎是象征性地)对于作为这些发现的社会环境的传言和争论发表看

法，以便我们至少借助于想像可以设想一下，社会—语言学观念的美好时代在索邦大学那里是什么，文学的十月革命在莫斯科和在涅瓦河沿岸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种阐述并不是毫无意义，哪怕就算是对于我们要阐述的那些极为枯燥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运动作一些补偿，也无不可。

4、相反，在有的著述中，巴黎符号学学派最新的研究工作，只是以与格雷玛斯多次在其作品中建议的历史分期相一致的一种历史分期形式，给予了非常简要的介绍①。因此，我们决定区分时间上的前瞻性介绍与现时的理论争论，同时在《我知道什么》丛书里另外撰写（与本书并行）一本《符号学》（*Sémiotique*），来介绍这门学科的系统分类学，而不再介绍其历史。正是在这第二本书②中，格雷玛斯和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同样，在第二本书中，欧洲符号学理论与皮尔士开创的美国符号学探索之间的对立问题也得到了阐述。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讲，作为索绪尔的同时代人，如果皮尔士这位有关符号及意义的哲学先驱者不出现在这本《符号学简史》中，人们将认为是不正常的。其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理由是这样的：直到最近一些年，皮尔士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涉及到的理论探索的发展中

---

① 尤其参阅《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0卷，N°3，第539—550页，巴尔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春。

② 据译者向出版社（PUF）所做的了解，这本《符号学》并没有出版，但作者在2002年主编出版了《符号学问题》（*Questions de sémiotique*）一书，意在汇总源于索绪尔理论和美国皮尔士理论的符号学研究的总体现状。——译注

未起到任何作用①,而人们今后在欧洲会目睹一种极为深刻的阅读(参阅《符号学》第三部分),这种阅读有可能在整个符号学世界得到很大的反响。反过来讲,欧洲的符号学已开始跨越以前与美国符号学相对立的关键性障碍,正通过对于大洋彼岸的阅读进行反思,并在对于自己是反证的解释当中获得一种启迪。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意味着,当前,一种有关美国传统的介绍,就像符号学版图的整体一样,可以在本着定理性和共时性的一种观点进行的符号学探讨中,而不是在对于一套严密的理论(人们在后面可以注意到这种理论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的连续发展情况)进行这种简短的论述中,更为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依赖幻觉:有关符号学的一种真正的历史,在目前还是无法写出的。只须想到《符号学史》(*Histoire de la sémiotique*)一书的出版商们(也许是草率的出版商)从那时起为符号学规定的任务和研究内容就足够了②。不过,我们认为,我们依据历史顺序整理的这一份材料,尤其可以为试图进行实际操作的人们能够从符号学理论方面了解到的东西,提供一些前景、一种新的和必要的看法。它还依据所获知识的先后,向那些无任何符号学学识的人们提供一种真正的介绍。

依据历史顺序(仅与其真实的历史有一点点联系,这种真

---

① 这种看法为所有的证据所印证,尤其参阅让娜·马蒂内(Jeanne Martinet)(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报告,苏格兰,1980),或是参阅桑多尔·哈维(Sandor Harvey)(《符号学前景》,*Semiotic perspectives*,伦敦,1982,第8页)

② 阿谢姆·艾斯巴赫(Achim Esbach)、朱根·特拉班(Jürgen Trabant)合编《符号学史》(*History of semiotics*)一书,本杰明斯,1983,第27页。至今,没有一项任务得到了满意的实现。

实的历史当然还没有很快写出来）对符号学理论做这种介绍，对于一门成熟的科学来说，是无法想像的；相反，对于一项刚刚开始而且说真的还只有很少值得介绍的特殊论题的科学设想来说，这种介绍更可以说是一种需要。

第一部分

索 绪 尔 与 符 号 学

第一章　难以说清的波折

20世纪的语言学与符号学思考，在很大意义上是被索绪尔的研究成果主导着。他的研究成果至少在欧洲引起了对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彻底的重新审视。虽然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思考（纳维尔[A. Naville]《科学之分类》[*Classification des sciences*]）由于继承了奥古斯特·孔特[①]的乐观主义而已经将"心理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经济社会学]）放进了诸如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定理性科学的"规律科学"之中，但索绪尔似乎仍然是有理由成为将语言学置于严密科学之内的第一位理论家。而且，毫无疑问，他的首批听众（例如阿勒贝尔·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1930年发表在《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上的《语言学幻影》[*Les mirages linguistiques*]一文）和其听众的听众（例如亨利·弗雷[Henri Frei]1950年在第9期《索绪尔手册》[*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上发表的《索绪尔反索绪尔？》[*Saussure contre Saussure?*]一文），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位日内瓦的老师（就像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自称的

① 奥古斯特·孔特（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译注

那样)的"普遍相对论"真真确确地成了言语活动现象之真正理性的理论化研究的第一个行为。

后来的问题便是要知道,索绪尔在彻底朝此努力之后,是否最终也可以表述出被确定为具有"有条件的必然关系"(纳维尔,第30页)的那些陈述的第一批语言学规则。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可比之于第一个建立近代物理学之构成性数字规律的伽里略?(在其之后,物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发现都属于是对于这种特定规律的纯粹的扩张应用。)他是否可以像第一个提出化学成分组合方程式的拉瓦锡[①],或是像系统植物学及其分类的创始人林内[②]?他是否最终使语言学"具有了个性",保证其获得自立科学的地位并以准确科学的方式来掌握其对象了呢?人们能否希望这项工作在因其几位学生的热情而得以流传下来的这部片段性著述中被证实完成了呢?还需要考虑,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知识是否可以自我证实是积累性的,从而使其可以在那些建立起符号及其意义之理论的人们中间(从叶尔姆斯列夫[③]到格雷玛斯[④],中经特鲁别茨柯依[⑤]、雅格布森[⑥]和普洛普[⑦])

---

① 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译注

② 林内(Carl Van Linné,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译注

③ 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丹麦语言学家。——译注

④ 格雷玛斯(A.—J. Greimas,1917—1992):立陶宛裔法国语言学家、著名符号学家。——译注

⑤ 特鲁别茨柯依(Nicolas Sergueievvitch Troubetzkoï,1890—1938):俄国语言学家,现代音位学创始人,著有《音位学原理》(*Principes de phonologie*)。——译注

⑥ 雅格布森(Romain Jakobson,1896—1982):俄裔美籍语言学家。——译注

⑦ 普洛普(Vladimir Iakovlevitch Propp,1895—1970):俄国文艺理论家。——译注

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连续性。

相信对于这种语法知识的发掘史会带有皮维・德・沙瓦纳[①]在同一时期为索邦大学的墙面和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所形象地表现出的那种肃然静洁，也许是错误的。缅怀皮克泰[②]（德・索绪尔《科学论文集》）[③]，会使人兴趣盎然地想到了一些“混乱的噩梦”，这些噩梦可比之于那些在语言学和符号学建立之初围而不散的噩梦，其目的是使之成为有着丰富内容和高度对立的研究领域。至于索绪尔的生平本身，也充满难以说清的波折，索绪尔 1878 年曾将和他时有联系的良师益友阿道尔・皮克泰与“其哲学家朋友”（……乔治・桑等）的激烈争论归于这些；但是，在索绪尔的生平之中，喧哗与骚动是服从于自由民的不动声色的静寂的。我们后面要对这些个人的悲剧做点介绍，因为它对于索绪尔的著述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我们将介绍其科学设想，最后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研究借以打算建立语言学特殊性也就是说建立当作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自立性的方式。

这个文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有关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种新的导论性文本。（已经存在着多种这样的导论，而且互不竞争，对于他这部著作的阐述非常之多。）我们下面对于索绪尔理论的一些中心概念所做的介绍，仅仅限于能够指出，对于试

---

① 皮维・德・沙瓦纳（Pierre Cécil 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法国画家。——译注

② 皮克泰（Adolphe Pictet，1799—1875）：瑞士古生物学家。——译注

③ 索绪尔《科学论文集》（*Recueil de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日内瓦，1922 年，第 393 页：“一些观念世界彻底动摇了，它们具有着对立的、不可协调的形式，在属于噩梦的一种混乱中相撞……”。这是引文（1）。索绪尔对重要的引文都这样标上了号码：从（1）至（24）。

图理解符号学新的广泛领域起源的人来说，这便是大门和必经之路。

1878 年，菲尔南德·德·索绪尔在莱比锡撰写《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两位主要代表，卡尔·布吕格曼(Karl Brugmann)和埃尔曼·奥斯托霍夫(Hermann Osthoff)，他们反对这位天才的大学生的研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科学与个人的对立，并以他们的不理解而在德国建立起一个很大的科学群体。二十五年之后，即 1903 年，在一篇于后人看来是为了捍卫这一研究工作的科学革新之特点的文章中，索绪尔透露了一些失望心态(仍然强烈地被人感觉到)，他则将此归咎于这两位教授。他以某种闪烁其词的方式结束了这篇有缺陷的文章，而这种方式也遭到了当时其莱比锡对手们的严厉谴责：(2)"研究语言学，必须在不受某种观察或某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进行，以便从一开始就平等地去安排一种现象例如音位规律(这是个人经验所不能观察到的作用)和每个人从儿童时就由其自己意识到的类比行为。这就是德国人的温顺表现"。这便是其"对于童年和研究的记忆"(《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第 25 页)。

这些话保留了索绪尔生活中多次表现出的动荡和秘密内容的痕迹。这些话相当准确地说明了《索绪尔情况》也就是《索绪尔现象》。《索绪尔情况》概述了一位严肃学者的生活，其非常零散的生平记录，通常显示他既被动荡的悲剧所折磨，同时又被一种有感染力的热情所占有。《索绪尔现象》记录了一部作品的灾难(消失与浮起)以及后来无可改变的光辉，然而，它也许仍不大被人所了解。

一、索绪尔情况：一个严肃生命的秘密悲剧

(1857—1913)

索绪尔留下的信件和自传性文字片段(《索绪尔手册》，第17期，第21期)，尤其是其朋友和学生的证明，构筑了一位专心进行智力研究的严肃学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完全是在欧洲几处重要的知识殿堂里展现过的：索绪尔在接受教育之后(特别是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并同时学习语言学之后)，他的活动便没有离开莱比锡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后来到了日内瓦大学。他发现待在莱比锡使他失望：自1881年10月，他来到巴黎上大学，他几乎立即接受了在高等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首次任课的工作，并经常积极地出现在语言学学会上，因为他从1876年起就是该学会的会员。但是，1891年，他拒绝了弥补米歇尔·布雷亚尔(Michel Bréal)在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的位置，在教书十年之后他"带着他所有同事们的遗憾"(因为他被授予了荣誉勋章)而回到了日内瓦。他在日内瓦担任了"专门为他设立的"一个讲台(梵语与印欧语言)，他讲了二十一年，直至他辞世(1913)，他每一年讲一门完整的梵语课。关于他在日内瓦的这些年的讲授活动，图利奥·德·莫罗(Tullio de Mauro)①曾经指出(第344页)："1897年，就是在日内瓦，开始形成了一组忠实于他的高才弟子，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课

---

① 关于索绪尔的生平，请参阅图利奥·德·莫罗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介绍，Payot出版社，1972，第319—389页。

程才变得更为特定、更为丰富和充实”。不过，人们注意到，1894年的“东方学学者大会”之后，索绪尔与外界很少联系，他对外的通讯也变得间隔很长和无规律可循。索绪尔自己说患上了“写信恐怖症”(épistolophobie)。而他发表文章，他的明显的科学活动，也变得很少，至少在纯粹的语言学界是这样。这时，他对史诗《尼伯龙根》[1]和他从荷马诗歌中而更经常是从印欧诗歌中分离出的字母位置变形词[2]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1905年，普通语言学和欧洲语言史的讲座教授尤素夫·韦特海默(Joseph Wertheimer)退休了，而从1876年就在日内瓦学习语言学的索绪尔过去曾经有意地避开了他的课。这时，他却被安排继承了这一课程。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有关语言学理论化的直觉才重新被唤起和公诸于众，他于1894年1月写给梅耶(A. Meillet)的信中已经谈过这种想法，他说要为此写一本书，已经有所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很有必要但却无法完成(《索绪尔手册》，第21期，第95页)，而实际上，这本书一直未能由他来完成：(3)“不论我愿意与否，这一切都将成为一本书，

---

① 《尼伯龙根》(*Nibelungen*)：根据日尔曼同名神话于13世纪创作的史诗。——译注

② 字母位置变形词(anagrammes)：组成一个隐蔽的专有名词的发音或字母，会在诗歌文本的表面分散开来，而使这个名词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对于诗歌的智力活动都是必要的。奥古斯特·孔特(《与人类的正常状态有关的概念的主观综合或通用系统》*Synth èse subjective ou système universel des conceptions propres à l'état normal de l'humanité*，1856)曾经赋予字母位置变形词特别的重视。但是，如果确实在索绪尔与孔特之间显示出许多接近的话，由于作为思想家的孔特对于20世纪的整个科学思考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人们贬低索绪尔同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借以摆脱实证主义的方式，就大错而特错了。

书中，我将既无热情也无激情地解释，为什么在语言学上使用的词语没有一个我可以赋予其某种意义。我承认，只有在此之后，我才可以重新开始我以前放下的研究工作”。这些语言学思考想必提供了他三次上课的内容（1906—1907，1908—1909，1910—1911），这些内容便是在他辞世两年之后由其两位学生巴利（Ch. Bally）和阿勒贝尔·薛施蔼依据多种笔记和索绪尔自己的亲笔记录（某些笔记可追溯到给梅耶写信的年代）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的来源。

因此，这种严肃学者的隐蔽生活，就像是充满了断裂，并在不同深度上带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悲剧，对于这些，我们从这些断裂、这些突然的离去和默然不语中可以看出。借助于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字即《关于童年和研究的回忆》①，人们了解到某种带强烈敏感性的东西。有关对于童年的刺人心痛的回忆（这种回忆也是由一个15岁的孩子对于真正的科学发现的回忆），这篇文字表达了一种恐惧和一种失望，因为，到了1903年，也就是在这一事件发生超过二十五年之后（尽管有着明确的漠视：（4）“我对于在科学上获得的和并不需要任何名称的东西，于神圣的惧怕之中，感觉到了某种个人的返回”），这种恐惧和失望仍没有消失：1872年，当索绪尔还是一名按照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中学进行重读的学生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种古希腊语词语变化的特殊情况：（4'）“在我看到 τεταχαται 的那一时刻……，当时我的注意力极为分散，就像我重读一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吸引了过去，因为我刚刚进行过这样的推理，这

① 施特赖特贝格（Streitberg）教授，是索绪尔明确指定的这篇短文的持有者（《索绪尔手册》，第17期，1960）

时它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λεγομεθα：λεγονται，因此，τεταγμεθα：τεταχNται，于是，N = α”。

这时的索绪尔刚刚发现了《鼻音共鸣》(*nasalis sonans*)①一书。三年之后，在他到达莱比锡的时候，他想必是惊异地了解到(4'')“几个星期以来，围绕着了解某些希腊字母 α 是否不来自于 n 或者某些 n 不产生 α 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我与一位德国学者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他把我三年半前的发现当作一项科学征服来介绍，而我当时将我的发现看做是我不敢去谈论的某种基础性的真实，因为它太为人所知了，我腼腆地对 H 先生说，这一点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或者是新颖[……]。人们后来在我的《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找不到我先于布吕格曼就了解鼻音的任何痕迹……这已经不是争回当初没有去争的优先发现权的时刻了[……]。我在《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做了更多的介绍，我回想起我是怀着某种痛心去这样做的，因为那是对我写作时的情况的最好的评论。我说：多亏了布吕格曼先生和奥斯特霍夫先生的研究工作，我们知道了 n 和 r，要知道，我个人既不需要布吕格曼，也不需要奥斯特霍夫”(《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第 18—24 页节选)。

对于他突然返回日内瓦之后的年代，邦维尼斯特②在评论索绪尔相对的科研沉默时说，这是“思想的悲剧”(《索绪尔手册》，第 20 期，第 12 页)，并且他采用智力的词语解释索绪尔

---

① 卡尔·布吕格曼 1876 年的著述。——译注

② 邦维尼斯特(Emile Benvéniste，1902—1976)：20 世纪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著有《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译注

1894 年 1 月 4 日写给梅耶的信件中的著名片段(3)。大概,对于索绪尔的这种隐蔽的感情生活的更为深入的调查以及对其某些自传文字的真正的风格分析,可以看出其智力情感上的破坏性力量。从其最大的快乐方面来讲,那便是对于一位卢梭式人物的爱好:(5)"可尊敬的阿道夫·皮克泰,即《印欧起源》(*Les 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一书的作者,是我家有一年在农村时的邻居,当时我 12 岁或 13 岁。我在他家靠近维尔苏瓦(Versoix)的马拉尼(Malagny)宅地上经常见到他,尽管我当时不大敢向这位杰出的老人提出问题,但我默默地对他的书产生了一种深在的和孩提式的敬重,因为对于这本书,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几个章节。借助于某些梵语的音节来重新了解已经消失了的人民的想法(因为这是当时的书籍和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想法),以一种天真的前所未有的热情激励着我;我对于语言学兴趣的记忆,远没有对于至今经常泛起的对童年时的贪婪阅读的记忆更为美好和更为真切"(《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第 16 页)。

关于抑郁的"激情",科学研究上的变化甚至可以留下一些痕迹:(6)"我不得不从我文章中撤回一些观点……尤其是,Aγ 与出自 γ 的音位的相像,曾导致我不自愿地放弃了流体和共鸣鼻音的理论,而我在成熟地思考之后,又回到了这种理论"(索绪尔:《科学论文集》,第 3 页,也可参照第 379 页)。

用于撰写《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手写的科学附注,并不是无争议和无悲剧的:(6')"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来以语言学的名义维持我们每天都在认真地反对的属于所有的错误、所有难以分辨的骗局的一种虚假的、生发性的一致性……"(恩格勒:《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IV,23 和其他地方,第 24—25 页),或者是:(6'')"在承认薛施蔼将语言变

成人类思维的一种独立的有机事物的打算是一种无稽之谈的同时，我们在假设这位印欧语天才或闪语天才一直注意将语言带回到那些命定的道路的情况下，毫不怀疑地继续想使语言成为另一意义上的一种有机事物。不只是一种观察使我们获得相反的深信……。这位语言的天才面对取消末位 O 的现象也作用为零，因为这个 O 每时每刻都能在无论何种先前给予的言语活动的形式中彻底改变符号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索绪尔：《未出版的笔录》，《索绪尔手册》，第 12 期，1954，第 62 页）。在这种突然脱离学院式正经风格的表现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索绪尔对于其几位听众的魅力之痕迹，正是这种魅力将这几位听众转变成了其热心的弟子，他们竟能将口头传授的思想保存了下来。

这种追求思想的激情，带有一种感染别人的热情，它与索绪尔对其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曾经于 1896—1898 年听过索绪尔讲课的杜肖塞（Duchosai）1950 年写道：“没有什么比他评价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方式更不平庸的了。他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困难，尽管有不少错误，他还是大加赞扬。可是负面的东西也出现了，因为某些错误也常常引起他的愤怒。有一天——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在说过我在一页很长的文字中只有一个错误之后，便以一种痛苦的神情告诉我他给了我零分，因为我在一种不可接受的情况里将短音 a 与长音 a 混淆了”（图里奥·德·莫罗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介绍文字，第 343 页）。

梅耶曾多次强调索绪尔在其讲解中表现出的智力诱惑力，因为在需要进行细节说明时，他会触及广阔的思想领域：“他的诗人的思想经常赋予他的讲解一种形象联想的形式，人们此后便无法忘记。在他指出的细节的后面，人们在猜想着一个充满

总体观念的激动人心的世界”。[①]

总还是有可能“直接探讨索绪尔”，而且是在叶尔姆斯列夫、邦维尼斯特、雅格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和格雷玛斯（我们在此仅指出其主要的几位阅读者）之后重新对其进行认真的阅读：索绪尔的手迹笔录充满了闪光的思想、宽阔的视野、具有解释性的价值，并借助于难以把握的悖论之可爱的隐喻性形象来提供一种迷人的阅读。我们现在以对于一种语言的词汇语义场的观察为例（恩格勒，II，C.22）：(7)“如果您以一种符号来增加语言，那么您就会同样地减少其他符号的意指。如果万一人们在最初只选择了两个符号，那么，所有的意指就相应地分配在这两个符号上面。一个符号会指明事物（或观念）的一半，另一个符号就会指明另一半”。在对于常识的这种荒诞看法的背后，形成了多种有关语言的动力学观念以及每一种新的表达发音都可以引起某种遗忘、某种意义损失的观念（这恰恰像普拉西泰尔[②]，为了使大理石顺从和成为有机整体，他每砸下一凿，都像是有一种意义在损失那样——如果人们将其海尔梅斯头像与代尔夫城取手巨大的象征力量相比较的话）。

在索绪尔看来，与科学问题不可分离的重大思想领域的另一个例证，可见于《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的导论中在谈到价值时的论述：(8)“这种（位于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主要区别

---

① “他的人格使人热爱他的科学；人们惊奇地看到，那副充满神秘的蓝色眼睛在极其准确地感受现实；他的似有掩盖的甜润和谐的嗓音，去掉了语法现象的干瘪与枯燥；面对着他年轻而高雅的魅力，人们想到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再指责语言学缺乏活力”（图里奥·德·莫罗引用梅耶的话，见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介绍文字，第336页）。

② 普拉西泰尔（Praxitèle）：公元前大约4世纪人，古希腊雕塑家。——译注

可以出现在其他领域,但从来不带有次要性特征。在语言学方面,人们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有别的科学:静态语言学或共时语言学和运动的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在所有关照价值的科学中,人们有可能或多或少有必要将现象划分为两个有别的系列。因此,经济历史应该区别于政治经济。有两种讲座"(《索绪尔手册》,第 15 期,第 69 页)。确实,在索绪尔考虑语言学的时代,关于价值的争论要求这样的平行性(一些证人通报了索绪尔曾经密切注意《经济心理学》一书的作者塔尔德[G. Tarde]与迪尔凯姆①之间的哲学争论。人们后来在《社会学年代》[*L'Année sociologique*]中看到了这种争论的影响),但是,这种突出总体观念的方式(在此是将语言学价值与经济学价值同时提升)仍然不以相同的自由性重现在叶尔姆斯列夫、邦维尼斯特甚至巴特的更为特定的思想中。

相反,索绪尔本人由于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经济"的传播力量,却大加赞颂皮克泰:(9)"在他的手上,一种这样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变成了学究和干瘪著作之外的一种东西:对于这些研究最为外行的读者,都可以在人们到处感觉到的充满活力的气息支持之下,很轻松地攀登碎石山坡,为的是与作者一起达到有重大发现的高峰"(《科学论文集》,第 395—396 页)。

这样保存只有纯粹的观念(即便它是最为抽象的)才可具有的能力的方式,在米歇尔·布雷亚尔看来,当然并非不是古怪的,米歇尔·布雷亚尔是在巴黎接待索绪尔(1880 年秋天)的老师,并很快(1881 年秋天,当时索绪尔 24 岁)交给他很重的教学任务。米歇尔·布雷亚尔在法兰西公学的开端性讲课(1868 年

---

①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译注

12 月 7 日）中的几段文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提供了这样的表述内容："思想是我们智力的一种自发行为，任何来自外部的努力都无法以直接和快速的方式使这种行为开始运动。您可以做的一切，便是向我的思想挑衅，而这种挑衅有时会与它模糊出现时同样强烈"，或者，还是在这部《言语活动的潜在观念》（*Les idées latentes du langage*）第 20 页上："对于潜在关系的自发理解，对于精神来说，需要一种真正的魅力，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与我们的语言同样是可分析的语言，它们通常将它们的词语以古希腊语或梵语的方式来汇集"[同时忽略借助于介词而明确的表达关系，如在"红—嗓子"（rouge - gorge）、主有复合词，或 vermoulu（ = vermi molutus）、因果复合词等情况中]。在布雷亚尔那里，就像在索绪尔那里一样，观念表达中的一个很好的节奏、采用启发多于说明的方式来激励思想的艺术、对于闪烁出现的思想的爱好，都属于最基本的内容。除此之外，作为学生和后来也成为老师的索绪尔，在其怀疑在这种热情之中有着某种对于研究是很危险的柏拉图主义的时候，也毫不客气地对布雷亚尔进行挖苦与讽刺：(10)"为什么要谈论省略呢？就好像有着某种规范，而在这种规范之下，词语是可以省略的[……]。省略不是别的，而是价值的多余"（戈德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第 50 页）。

这位日内瓦老师的表述并不低看悖论（有时戈德尔指责索绪尔"放纵其对于悖论的爱好"，《〈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第 247 页）。在此，索绪尔是否表明他属于与他在"童年记忆"（《索绪尔手册》，第 17 期，第 16 页）中讲述的有关他祖父亚历山大·德·普塔莱斯（Alexandre de Pourtalès）的那些趣闻有联系的一代古怪和精明之人呢？他手写的某些笔录，在阐述出现

转折的时候，表现出某种狂喜：(11)“在很好地研究了历史之后，应该忘记过去，以便研究共时性。这是一种悖论，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比了解一个时代的东西之形成更为重要的了。但是，很明显，这是一种真实的悖论，因为鉴于两个音位不可减缩的本质，就必须使‘过去’抽象”，并且在总结这同一思想活动的时候，一种新的观念产生了，他感叹道：(11')“如果人们想赋予共时现象一种适当的表述(用它的使用对立来代替一种意义对立)，那么就应该说明它出现在哪些单位之间[……]。于是，人们会看到一种有意思的事情：在语言学上，在现象与整体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多么不可思议！”(《索绪尔手册》，第15期，第66—67页)。后来，在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符号学研究，才破释了这个在闪现之中方可把握的悖论。

对于悖论的爱好，并不仅仅是18世纪的精神在1900年的一位学者身上留下的痕迹。它更深刻地关系到要彻底改变再现方式和概念的一种天赋，这种天赋在于尽可能长地维持在一种难以忍受的总体观点之中，以一概全，以便为新的完全古怪的思想留下自由的领域。1950年，在一篇针对那些不能达到理解“老师”思想的人而写的文章(《索绪尔手册》，第9期，1950，《索绪尔反对索绪尔?》)中，弗莱(H. Frei)在谈到索绪尔关于观念不先于其在语言中的形式而存在(参阅第8页)[①]的论断时，承认：“今天，这仍然是他的观念中最为新颖、最为革命的观念。[不久前，薛施蔼]承认(《语言学幻影》，第342页)，不可能更为

① “不管人们取用所指还是能指，语言既不包含先于语言学系统而存在的观念，也不包含声音，但是它只包含概念区别和源于这一系统的语音区别”(《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6页)。

坚定地使语言学摆脱想像的产生，也不可能更为直接地违背我们思想的自发性”。

最后，另一方面，对于悖论的这种特殊的敏感，也许来自于语言学对象的特殊本质：言语活动是以其经常是双方面的本质为特点的材料，在索绪尔看来，在科学上最为悖论、最为丰富的观点，恰恰出自对于这些二重性的思考，而通常更是出自语言学的二律背反。

二、索绪尔现象

索绪尔试图建立的观点具有彻底的新颖性，但它们不足以解释其著述的变化。生前，他未能在莱比锡被人承认，但他却立即在巴黎被接受为大学者。这是否就是说，他的真实的著述、他的思想从那时就被人承认了呢？《法语》杂志第63期曾刊有对马蒂内(A. Martinet)的采访[①]，80年代初期，马蒂内透露，作为法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师和最受索绪尔好评的他的通讯人的安托万·梅耶，从世纪初至1936年去世之前是如何不了解《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观念所代表的智力洞察力的。

尽管《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其去世后于1915年就出版了，但这位日内瓦的大师直至1927年之前一直不被看重。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波兰研究者杰尔赛·库里洛夫维奇(Jerzy Kurylowicz)“在一种历史语言中重新发现了赫梯语(le hittite)，他当时以其书写形式h对其再一次进行了破释，这个音位早在五十年前就由索绪尔确定为一个印欧语中的共鸣音位。这一很好的

① 《法语》杂志(*Langue française*)，第63期，第68页。

观察致使1878年经过推理而假设的理论实体得以显示(邦维尼斯特,《索绪尔手册》,第20期,1963)”。这样的一种科学经历,很像是天文学家终于有一天用望远镜发现了他们此前通过计算得知但并无任何实验显示而存在的星星,这种经历必然会激励想像力。库里洛夫维奇的发现,对于语言学来说,提供了在科学意义上的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明确的例证。当索绪尔经过演绎推理而提出希伯来语中尚未得到确定的亚元音(chva)(A)之假设的时候,这种发现本身恰恰就是使其遭受他的顽固的反对者奥斯托霍夫教授最为猛烈和最叫人灰心的批评的东西。

格雷玛斯曾经把梅耶去世后法国语言学的形势描写成“直到1945—1947年前是一种理论空白”,这种空白让诸如他本人和马托雷(G. Matoré)这样已经开始阅读索绪尔以便建立词汇学的人去做一切(《法语》杂志,第63期,第75页)。索邦大学法语语言学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语文学和历史语法学的实证主义所主导,这种研究的真实情况,不再是从哲学角度对语言学进行研究的出版物的真实情况,因为在那时,理论语言学被看作是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1930—1954年间发表在《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上的某些重要文章,证明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波兰的研究者在经常关注索绪尔的理论。

另一方面,日内瓦语言协会自1941年之后便投身于每一年出版的《索绪尔手册》之中,这一手册将很大的版面留给了西欧的语言学研究。对于索绪尔主义的兴趣,表现在对于《普通语

言学教程》原有文本的制订的研究方面[①]。对于索绪尔著述的这种关注，既是结果又是原因，它还应该与这种思想在语言学之外特别是在结构人类学方面的影响联系起来。自 1945 年之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分析》(见于《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I)。于是，索绪尔的思想一下子被推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主导理论，它成了一种时髦，直到 70 年代达到了其高峰，这当中，它激起了众多的吵吵闹闹的出版物的认真的争论，这些出版物的争论虽然不总是注意科学的严密性，但对于阅读和重新阅读索绪尔的著述起到了巨大的推行作用。他的声望在争吵和张冠李戴之中达到了顶峰。当这种一时的现象开始淡薄，这位日内瓦理论家的重要性从此便无可争议。

---

① 参阅戈德尔著述，1959，再参阅恩格勒著述，1968。

第二章　科学设想

索绪尔对他的智力事业即他的认识论(gnoséologie)所能进行的总体表述，表现为众多的意愿声明和众多的毫不含混的价值判断。甚至在其个人处于最为严重的痛苦时期(见其1894年1月5日写给梅耶的信，引文3)，这些立场也都表现出他毫不动摇地相信**语言学研究工作具有一种真正理论性观点的**价值。语言学的这种理论化，我们已经看到，它与一种更为总体的概念是分不开的，这种概念在于为这种正在形成的科学在科学的分类之中指定一种合理的位置。这一点使索绪尔预想到，语言学理论的最为一般的问题和结果，将在另一种更为抽象的系统中得到重新的分组，这便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符号学**，他提前将这种学科放进了与数学一样的定理性科学之中了。

一种真正的理论观点。索绪尔赋予"理论"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呢？索绪尔在为薛施蔼的著作《理论语言学的规划与方法——言语活动的心理学》(*Programmes et méthodes de la linguistique théorique——La psychologie du langage*)手写的评注中，提供了对他所理解的该词的简练而明确的表述：(12)"博杜安·德·库尔特奈(Baudouin de Courtenay)和克鲁杰夫斯基比任何

人都更接近于语言的一种理论观点，这并没有脱离语言学的考虑；此外，他们并不为西方学者所普遍了解。

“我所敬重的美国人惠特尼[Whitney]从来没有对这些尽管不正确的主题说三道四；但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不认为语言需要一种系统分类法”。在后面的一处，他尖刻地指出了“马克思·米勒[Marx Müller]的语言学意图的庸俗性……这种意图对于朝着建立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既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认真的热望”（戈德尔，第51页）。

对于博杜安·德·库尔特奈和克鲁杰夫斯基的颂扬，再一次拒绝了不来自于语言学技术性本身的任何考虑，因为这种考虑把理论观点当作一种归纳性活动来介绍，而这种归纳性活动是严格地听命和受制于真正地为了唯一的对象——“语言”（不包括邻近科学例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种对象，也不包括任何普通的哲学考虑）所进行的首批探索的演绎性结果的。就像对于任何自然科学一样，奠基性的决定存在于对于首批概念的选择之中，因为这些概念限定了所说的对象。从这些奠基性的概念之中，将演绎出抽象的、普遍的和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服务于对于这种科学的相关事实的确定。当然，首批概念彻底地将一种科学区别于另一种科学。

当然，如此设定的科学思考是一系列总体的观念，但是，由于它们是严格地与一种特定对象相适合的，所以这些观念就不是发明的，而是通过一种观察来发现的，而这样做，是要付出习惯上只有求助于天才方可进行的无法模仿的思维劳动之代价的。严格说来，只有当一种补充性的思考被用来建立各种发现的一致性和服务于它们的系统建立的时候，才有“理论”。对于博杜安·德·库尔特奈和克鲁杰夫斯基的毫无保留的颂扬，使

人想到，这两位俄国研究者已经具有了系统化的考虑，这种考虑在于赋予理论一种足够的能力，以便能够预言尚未观察出的新现象（就像索绪尔本人在《论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所做的那样）。相反，“美国人惠特尼”的理论兴趣很弱，由于缺乏建构带有方式性价值的整套内容的努力，所以他全部正确的观察注定不能协调。另一方面，对于米勒的严厉指责，证实了索绪尔的考虑恰恰在于将语言学列入规则性科学（按照纳维尔的分类，为定理性科学）之中。

这种对于抽象而又是演绎的科学性的热望，就是以索绪尔为中心的那些社会科学的各方面奠基者们的热望。这就要相互接近，这种接近是建立在认识体系（épistémé）的内在联系基础上的，而不是像托洛切夫斯基（W. Doroszewski）所想的那样，是索绪尔对于迪尔凯姆那里的直接借用。关于在人文科学上是必要的这种科学性的概念，也出现在戈布洛（E. Goblot）1898 年出版的《科学之分类》一书中；它还是迪尔凯姆的概念，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学方法的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1894）一书中再次提到，社会学是多么需要独立于哲学，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独立于任何先天的概念，为的是“可以面对现象本身”和变得可以演示。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不限于获得统计数据或其他什么。它在依靠一种明确的和客观的方法学（在此，便是共变方法），尽力组织现象系列，并尽力建立规则。

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理论家们赋予科学规律的绝对价值。按照纳维尔的说法：“最严密的科学，即任何人不能对其科学的特征提出异议的科学，都是只考虑可能性。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呢？……根据几何学的陈述，在一条直线上取一点，人们就能够

由此引出一条垂直线,而且只能引出一条垂直线"。在政治理论方面,以同样的方式应该有一种定理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可能增加国家的职权而又不减少个人创意的作用呢?因此,必须确定可能和不可能之极限,[要知道]在变化的和不确定的极限下面,有着固定的和严格的极限:2+2=9是不可能的;在水的构成中,改变氧气和氢气的比例也是不可能的。这些要越过的不可能的极限,在任何人看来,它们始终并在到处都是规律……规律并不容忍例外"(节选自《科学之新的分类法》第12—14页、第30页)。规律的逻辑本性,即"按照一定的条件是必然的一种关系的本性:第一项一旦提出,[……]那么第二项也必然产生"。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u>规则</u>一词指定的内容,当然属于这样的范围:(13)"在不想穷尽规则之概念的情况下,规则这一术语确实要求两重观念:

1、一方面,是规则性或'秩序'观念,2、另一方面,是其强制性特征即强制的必要性的观念"(恩格勒,I,1525)。或者(同上,IV,3310,8),索绪尔以"<u>规则</u>"的名义在其简短的研究评注之中重新采用纳维尔的术语:(13')"规则:1、语言的普遍规则是'强制性的'(定理性的);2、语音'规则'!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享有这个名称;3、共时性特有的规则,不是强制性的。我们不去对规则这一术语进行高深的哲学论证,我们就按照通常习惯即大家共用的意义来取用它"。

按照这种通常习惯,在规则和理论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呢?一种理论,就其自身来讲,并不是一种规则。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性描述,可以被拒绝,而一种规则就不能被拒绝。但是,对于新的规则的发现通常归因于为解释已经被认识的规则

而进行的理论表述。理论是通常不大抽象而更为人熟悉的描述,其功能是潜在地综合许多数据,并将其包容在一种总体的图式之中。

《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中经常使用"理论"一词,这就使得人们可以评估该词对于索绪尔来讲有多么重要。它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使用频率是多少呢?依据对 T. D. M. 版本所做的索引,是零,这个索引中包含着大量与"规则"、"系统"和其他同领域术语有关的附注。(另一方面,恩格勒的《索绪尔的术语学词汇》也没有"理论"一词进入)可是,每当"语言学"一词出现的时候,几乎都要完全地恢复"理论"这个词:在索绪尔形成他的观点的那个时候,在他看来,语言学理论还不存在,但是他已经同意建立这种理论。因此,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必须还"语言学"一词使用的动力价值,这种使用表明一种科学尚待建立、一种理论正在形成。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la linguistique)或者意味着"语言学的理论",或者意味着"语言学领域"(le linguistique),即这种理论用来作为对象的领域。

(13)"**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这种科学形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其定名为符号学(sémiologie)"。符号学一词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中的出现(第 33 页),由于它是进入了心理学领域,而变得非常莫名其妙,更何况索绪尔在其某些评注中把符号学介绍为心理学与语言学之间的一种联系,并且他在批评薛施蔼的著作(戈德尔,第 52 页;恩格勒,IV,第 43 页)时,强烈地反对语言学依附于心理学。另一方面,在常识(必要时,这种常识也使不少这些学科的

专家们加入进来）看来①，心理学从定义上讲是非社会的，因为它以个人主体概念为前提，这种主体是在其社会的限定之外和在其严格的个人维度之中被考虑的。人们在戈布洛的著述中也看到了这种使用，因为戈布洛将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就像“个人心理现象与社会生活”那样（1898）。

在迪尔凯姆方面，这位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在其发表于《玄学与道德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上的一篇文章（1898 年 5 月）中，尽力在两种学科之间考虑等级问题，它们是“个体表象与集体表象”（第 273—302 页）。他假设，如果我们将心理学理解为个人心理学，人们就不能将对于社会性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应用心理学。通过与有机生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首次比较，他指出，生活的特性是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其基本成分之中得到研究的，他主张，他继续通过与个体的关系来考虑社会现象。第二次比较，是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进行的，这种比较导致一种新的类比：就像一位个体的思想是以其全部的精神细胞作为基础而无须其表象直接从这些细胞的某种状态派生那样（表象取决于最初的综合），社会现象也不能被看做直接是由个体的意识产生的；社会现象强加给个体，并限制他。当然，人们可以断言，社会意识取决于具有接触的个体成分的数量与倾向，但正是在这种接触之后，一些表象显露了出来，并独立地进行组合。因此，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个体心理生命的组成标志，但是它们处于“更为强大的位置，为的是构

---

① “当我们只是简单地说心理学时，我们理解的是个人心理学，而且，为了讨论的明确，应该限定该词的意义。集体心理学，便是整个社会学。心理学一词总是指个人身上的精神科学”（迪尔凯姆，见上面引述的文章）。

成某种全新的东西”。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构成社会生活的表象都是些最初的综合,而用来描述这些综合的科学,即便还被称为“心理学”,但必然具有一种新的、非常区别于个体心理学的形式。

在索绪尔提出把符号学看成社会心理学一个部分的时候,这难道就是他想像的(带有其尚包含全部心理内在性内容的)某种“表象”吗?他从未放弃机会去论断语言的社会维度。他相信对于各种语言的系统研究就可以以某种方式来确定作为迪尔凯姆建议赋予其城市权利的社会生活之产物的“这些表象、这些最初的综合”吗?

有时候,索绪尔也准备进行历史重组,他同意向一种给定的语言状态索求有关印—欧结合(OS,第480页)或古代雅利安人(Aryas)(OS,第400页)的农业、而因此更为广泛地有关日常生活表现的考古证据。但是,他不掩饰他的优越感(《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04—312页),在他看来,局限于对词汇进行好意的批评是无益的,是在满足于小小的好奇心和获得趣闻逸事。按照这位日内瓦大师的考虑,大概并不应该是本着这种方向去想像“社会心理学”。

在索绪尔有关“不可躲避的义务”、语言机智加给个体的限制、而尤其是有关无人可以主导的语言变化之因素(《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第108—112页)的思考中,他把社会事物想像成为一种重力,这种重力因其自身质量而有效,同时又服从于另一种重力即时间因素。这些参与成分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被怀疑具有个体化的心理体系,而且如果在语言中出现创造,那么这种创造就像是冰河沉积物,就像是“人们在冰河畔见到的大块冰碛石,那是一大堆惊人的经世历纪的东西的一幅图画”(在日内

瓦大学的第一次报告会,1891;恩格勒,IV,3281,第5页)。

语言体系长时间记录下来的沉淀,不具备"集体表象"的形象化特征,没有任何"语言天才"能够规范这些沉淀,它们不能按照认为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之中(在只具备很少概念工具的原始社会与更富于沉淀和对于无数概念性试验具有集体记忆的进化社会之间——这一研究课题曾经成为迪尔凯姆和莫斯[①]在《社会学年份》一书中几篇文章的内容)还会继续进步的一种使人惬意的意识形态来得到描述。语言在几千年过程中的符号学发明(在索绪尔之前,人们大概是想到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复杂性,而使用破坏和糟蹋最初漂亮结构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发明),采取了卢克莱修[②]《弧形运动》(*clinamen*)的随机做法。我们不要忘记,"将词尾的O取消,每时每刻都可以最终使符号与观念在先前确定的不管什么形式的言语活动中得到变化"(《索绪尔手册》,第12期,第64页)。

可是,这些与时间的过渡相联系的不确定关系(因此是历时现象),又在一个不太表面的层次上被语言的逻辑组织重新掌握。这种组织构成一种深在的编码,它不大受变化影响,因此确保了言语活动传播的连续性,而变化之试验则在更为表面的层次上进行。因此,深在的编码体现了一种对于变化的抗拒,并恰恰构成可以使更为可见的编码的表面变化成为可能的框架。例如,人们会观察到,虽然解说复数的方式从拉丁语变成了法语,但复数在语言的整体经济之中的位置并没有同时改变。当

---

① 莫斯(Marce Mauss,1873—1950):法国社会学和人种学家。——译注

②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大约公元前98—55年):拉丁诗人。——译注

更为表面的约定发生变化的时候，编码的更为抽象的深在构成继续维持着。也许应该像布罗代尔[①]那样谈论很长时间，并且假设，这些重大的范畴因很久以来就没有被触及而是一种积淀（与历时变化的未加工冰碛石相反，这种积淀可以自我加工），还要假设这些范畴是语言的真正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又产生可以蔑视时间的无法预料的形式，这就完全像煤炭、石油和钻石沉淀成蕴藏着难以预见的财富的矿藏那样。“宝藏”（《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第30页），“社会结晶”（同前，第29页），是索绪尔用来定名语言之运作的几乎是地质学方面的用语。（言语活动沉淀的创造性之形象，在梅洛－蓬蒂[1945，第221页]的著述中是以非常有别的看法出现的：“在所有表达活动中，唯独言语能够沉淀并构成一种主体之间的成果”）。

因此，这一切，就好像这些在无限长时期中积累（简直就是一种古怪的炼丹术）起来的社会经验过去一直在转换成带有逻辑连接的补加事物那样，它同时产生着一种特殊的理智，这种理智既是语言理性主义的主体，最终又是符号学的对象。显然，有必要过问一下语言理智与哲学理智以及与学者们的理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恰恰是这类问题，符号学理论对其无能为力，而只能留给哲学。

这一次，这些积淀是从共时性方面来理解的，它们的出现就像是“在所有的语言中都以固定和普遍的方式相互作用的一些力量”（《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0页）。这些“力量”（指动力的、有时在这个术语下又是形象化的价值，而没有用更为抽象的

---

①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新史学”代表，以写作鸿篇巨著出名。——译注

“关系”一词）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精神”的表述。因此，我们在后面研究索绪尔的社会心理学的时候，将更侧重于揭示和开发这些非形象化的意义矿藏。在这种条件下，限定给这种“社会心理学”即符号学的任务之一，当然便是揭示作为意指之基础的这些固定而又普遍的关系（而无需过多地过问其天生的或很久前就获得和确定的特性）。

因此，索绪尔有关社会整体之符号学的创造性的图示化，与迪尔凯姆的图式化相比，显然更不表现为是人类学的和心理学的。对于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解释的这种非心理化运动，尤其在借助于相像关系或比邻关系而形成的各种联想的问题方面被观察到（《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0—180页），这个问题想必在由罗曼·雅格布森对其进行的重新解释（其有关失语症和诗歌的论述）之中和由雅克·拉康[①]将其重新引入的精神分析学之中（“换喻欲望”）获得了成功。在我们上面引述的文章中，迪尔凯姆曾经对这些联想做过很长的介绍。在迪尔凯姆的表述（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旧心理学问题）即思维与言语活动相互关系的表述与索绪尔的表述方式（以严格的联想系列和组合系列的术语，这些术语是一种真正的元语言的首要成分）之间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位语言学的奠基人在理论上的变化。

格雷玛斯（其整体著述表明了对于索绪尔著述的深入读解）在其发表在《索绪尔主义的现状》杂志（*L'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1956）中的文章里提出了社会心理学问题。这位符号

①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学家承认列维－斯特劳斯[1]和梅洛－蓬蒂在建立一种非心理学的心理学这种新的却又是悖论的知识方面所做的贡献，但他也抱怨梅洛－蓬蒂低估了（第200页）“这些问题的真正的社会方面：一般的品行和集体的结构有利于创作者的个体性和非正常性”。这种简单的指责带有新的意味；这大概是第一次对于在法国文学思想当中明确出现的对于文学再现方式的机制、俗套、编码事物、自动性进行关注的表述，要知道，在20世纪之初的俄国，这些再现方式已经引起了那些进行形式主义探索的人们的注意。我们后面将有时间指出，对于庸俗之物和常识的这种新的观点，是怎样决定了符号学事业的存在的，因为符号学不久最终将有权将其研究的结果作为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真正贡献来介绍。

①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法国人类学家。——译注

第三章　语言的特殊性

(14)"某些真实被发现[……]。不要谈是公理,也不要谈是原理,更不要谈是论断。在纯粹词源学上讲,它们'仅仅是'一些格言。[……]'但是[b]'它们是真实地经常出现的一些极限,人们就是从此出发的"。

——索绪尔,N,第19页
恩格勒,IV,第42页

索绪尔将"语言"作为其对象,他将其定义为"言语活动的内在秩序":(15)"语言本身是一个可以划分的整体。人们可以赋予这个整体即语言在言语活动现象中优越的地位;因此,即便言语活动不可划分,但人们在言语活动内部将有一种内在秩序,同时使其一切取决于语言"(恩格勒,I,D172,第32页),那么,他最终得以建立了这种新的科学性了吗?人们是否可以说,他在处理语言现象的方式之中,创建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的科学计划已经实现了呢?索绪尔是否是言语科学方面的安培、牛顿或爱因斯坦呢?是否发生过索绪尔革命呢?

索绪尔的著述,就像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一样,它再一次预示了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任何答案:索绪尔一直喜欢对于范畴的确定提出多方面的问题,并且他决定将其全部发现以其本来的状态(尽管在他看来是矛盾的)进行传递,而不是冒险进行尚不成熟的系统化工作(参阅在此以铭文形式安排的格言,引文14)。

另一方面,在对索绪尔主义的科学性提出问题的研究者们中间,还应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部分是承认已做研究工作的认识论学者,另一部分是延续这种研究工作的生产者。后者在索绪尔的陈述中感受到一种"启发性的潜能"(格雷玛斯,见于齐尔贝尔贝格所著《返回索绪尔》[*Retour à Saussure*],第4页),而且他们在使这种潜能从潜在阶段过渡到实现阶段的过程中找到了它:那时,格雷玛斯从60年代末就提出了第一批代数步骤标记方法,以及第一个真正的符号学"模式"(符号学矩阵),他进入了真正的索绪尔主义的延续之中。实际上,虽然人们不是完全地确信在索绪尔的著述中发现了他所在时代的物理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或规律,虽然在这部著述中没有"模式"或者没有各种结果的代数理解(建立表达方式和方程式),人们还是在其中找到了对于它们将在后来存在的时间的预示:(16)"总会有一天(我们在此绝对地意识到了这种断言的重要性),人们将承认言语活动的'价值'以及[b]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的性质之中借助于其数学上的形式是可以'正常地'得到解释的"(恩格勒,IV,N.10,第22页)。

但是,如果创造性的探索如此证实了正在从事的运动的话(这将是我们第三部分的介绍对象,我们将指出这种创造性探索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认识论学者们的评价和确认也

就值得人们在此驻足,并值得人们现在说出点什么。(由于这本书篇幅不大,并且我们自己打算提出的命题是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发展,所以这种练习将一定是有限的)。

阿马凯尔(R. Amacker,《索绪尔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saussurienne*,1973)启示人们在索绪尔主义中去看一种"很弱的形式主义"(第11—12页),同时指出了索绪尔采用数学式标记法意图的很容易看出的极限。这种"很弱的形式主义"概念虽然依附于索绪尔,但它在两个方面是与时代不符的:与他的研究进程相比,尚为时过早,因为他自身还在对其研究进行最后严格的评估(1894年写给梅耶的信,引文(2),并在其全部手迹评注中出现)和无法摆脱一种<u>历史</u>的追溯既往的观点,因为人文科学中的形式主义是索绪尔主义的一种产物即一种结果。索绪尔著述中没有"很弱的形式主义",而更可以说是一种前形式主义、一种对于形式主义的期待、一种完全安排好了的思考,为的是真正的语言学计算的形式化有一天成为可能的。(这一点是阿马凯尔在这部非常详细的著述中所没有看出的)。

诺尔芒(C. Normand)在发表于1970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探讨了将阿尔杜塞[①]的"认识论割裂"(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的概念用在索绪尔方面的可能性,就像菲尚(M. Fichant)和佩舍(M. Pêcheux)所做的那样。这种思考是巴什拉尔[②]关于"认识论断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的观察的延续,并且明显地是属于历史—批评类型的一种认识论的"敏感性",因为它也是参照了康吉扬(G. Canguilhem)的研究工作才提出的。诺尔

---

① 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译注

② 巴什拉尔(Gustave Bachelard,1884—1962):法国哲学家。——译注

芒在拆析了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个示范章节所转达的通常是矛盾的、本质上是认知的过程之后，据此做出结论说（第44页），这大概就是索绪尔所进行的一种认识论割裂的事实："如果有认识论割裂的话，那么，它就处于价值概念的制定之中——在这种概念与一系列设定密切关联的情况下：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区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将语言定义为系统"。二十年之后，因为索绪尔新的手迹的发现和出版（恩格勒，1968—1974）以及其他人对于认识论的挖掘（贝特[E. W. Beth]，帕里安泰[J. -C. Pariente]）与传播，将这种结论与某些批评意见对立起来变得成为可能，并以此作为对于索绪尔的理性进行新的评价的出发点。

——索绪尔非常重视一组陈述，这些陈述可能就是他认为可以在其中"重新发现真理"（引文14）的那些"真相"即"界限"，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些陈述内部特别看重价值概念呢？难道对于这些真理的数目进行整理和为其划分等级不是更值得做的吗？这是为了结束对于索绪尔概念的无序而又刺激人的列举，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摘之中。

——为了进行这种概念动力学的再现，有必要求助于比"认识论割裂"更不具范畴性但却更为成型的一个问题体系。

在从《普通语言学教程》整体内容中试图提取这些"真相"、"这些界限"（"人们谈论的真理就不变化地处于它们之间"）的第一个名单之前，我们要重新提一下，索绪尔曾经极为细心地向非科学的语言学家们指出了他们所习惯潜心从事的实践和作为："向他们指出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写给梅耶的信，1894，引文3），并且：（17）"这将是在各个时代都存在的一个哲学思考主题，在德国产生、在德国形成并在德国被多方面的个人所珍爱

的语言科学，在五十年当中，竟然不曾想达到这种抽象工作的水平，要知道，这种抽象工作对于一方面主导人们正在从事的事情、另一方面主导人们所做的事情在什么方面具有合法性和在所有科学中存在的理由，都是必要的”(《索绪尔手册》，第12期，第59页)。对于做(faire)的这种强调，要求人们不忽视赋予这些表达一种充实的意义，索绪尔曾打算对于其他语言学家们的科学之做做出统计(依据这种做之认识论基础，而排除过问任何元语言)。

他自己的这些陈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有什么地位呢？“借助于一种个人的非常独立和非常延续的努力”，(18)“奠定建筑物的基础”，研究(18')“言语活动的基本内容”是索绪尔称赞阿尔贝尔·薛施蔼所做的值得赞扬的行为，但是同样确实的是，这种努力(18')“是唯一可能的，只要能够将‘一种真实的思想[b]’、‘[一种真实的]哲学能力，或者最好是外在于[……][b]所缺少的语言学的一种多学科的教育’集中于对于语言的认识即可”。书中并未明显地说，这些设想和这些知识无论如何都属于这样自我介绍的人，但明确的是，他介绍这种信誉，而且人们在应该置于索绪尔文本之外的那些陈述－界限－真相，就存在于对这些基础和这些基本内容的研究之中。我们提出的名单是临时的和直觉性的，它取决于对各种引申(阿马凯尔、图里奥·德·莫罗、戈德尔)和索绪尔亲笔文本(《科学论文集》和恩格勒《普通语言学教程》版本)的综合阅读。因此，这里涉及到一种学说史，这种学说史是依据其他学说史在一种间接的时刻建立的，在这种时刻里，符号学已经可以建立对于索绪尔留下的大堆手稿的一种更为系统和可靠的读解了——但是，这种工作尚未得以进行，而《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大部分基本性概念还保留

了一些难以确定的方面。

这些基本陈述可以被介绍为对于一套问题的答案，如：

——“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言语活动。

——何谓言语活动？言语活动是“当人试图借助于一种必要的约定来表明他的思想的时候所产生的东西”(19)(恩格勒，IV，3342，1)。

——所有言语活动的共同特性是什么？符号的区别性、系统性、或多或少是任意的构成、符号的两面性特征。

由此得出，下面的四个陈述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将指出它们的抽象性，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心理考虑；这些陈述列举了它们意欲给予最初定义的语言－对象的首批特性：

(1)“在语言中，只有无肯定界限的区别”(《普通语言学教程》，166)。

(2)“语言是一种系统”(同上，107)。

(3)“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上，100)。

(4)不管采取什么观点，“语言现象始终表现出两个面，它们相协一致，其中，一个只有通过另一个才有价值”(同上，23)①。

---

① 我们不打算详细解释《普通语言学教程》，因为它在这些概念方面是很明确的，而且图里奥·德·莫罗的评注又提供了很多的补充信息。因此，我们依靠帕约(Payot)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来丰富我们依据现有的“注释”认为已经了解了的有关这四个陈述的情况。

我们会观察到，这四个陈述，其使用并不限于自然语言。实际上，它们对于所有的意指系统都是真实的，但要有一些变化。例如，人们可能感觉到，任意性在图像特别是摄影的情况里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关于图像的第一次符号学论述（巴特，1961 和 1964）就曾谈到，图像就像是一种相似物，它与其所再现的东西相像，因此它通过一种非任意的关系与它的意指相联系。

因此，这些陈述的作用便是将语言学记入与共同具有这些特性的那些实体相联系的更为广阔（**A**）的一个**整体**之中。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可以在其他现象之中把握"语言"现象，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它是"言语活动的内在秩序"，任何其他的探索（尤其是传统的语法探索）都只能将其感受为一种多元性、一种带有不规则数据的非顺序性集合体。语言在图像的言语活动一侧、在聋哑人的言语活动或其他许多约定性意指系统一侧，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学。这第一个运动是一种个别性的普及化操作过程，说是普遍化（généralisation），是因为这种操作过程超出了语言，以便得以进入它所属于的更为广阔的整体之中；说是个别性的（singularisante），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一种特性名单，这些特性只关系到各种言语活动。而且它们赋予这些言语活动一种抽象的定义，这种定义的适应性在研究工作的延续之中得以验证或被取消。

后面的操作（是第一次操作的补充和与其不可脱离）在于回答一个新的问题：语言作为言语活动的特定性质是哪些？

这就要回过头来提出**个体化操作成分**（B）（opérateurs d'individualisation）的事情，这些成分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区分和界定作为特定符号学的语言。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在任意性方面的

改变，是怎样可以使这种任意性像个体化的变化那样来运作的：例如我们假设有一种图画系统，其中，各个单位都是单独的形式，它们被看做是可以被公众的社会文化共识所辨认的。这样一来，例如一系列用来区别孩子们的书桌的图画，一只刺猬、一个孩子、一个草莓……。在富有儿童敏感性的绿色天堂里，这种系列的每一个符号都具有一种积极的、部分地独立的价值，它可以在孩子方面引起几乎是图腾崇拜式的选择——而在此后，也就不再有许多任意性了（在陈述(3)上的变动，第42页）。这种图画系统，按照索绪尔的意义如果还是符号学的一种可能对象的话，它就不像语言那样被判定是任意性的，因为语言的特征是完全任意性的。

可是，不出现在第一个陈述整体中的新的标准，又介入了进来，为的是使语言从其他真正约定性的符号学中区分出来。索绪尔指出了与视觉符号学（图像、绘画、公路指示标志、地图和设计图）的平面特征相对立的语言的**线性特征**（linéarité）。第一个标志，只是我们在索绪尔著述中看到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是用来运转"个别性的普遍化对立于链式连接的个别化"这种逻辑机制的，在我们看来，这种机制在这一点上正是索绪尔方法的特点，但就是在此，这位日内瓦的老师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领域，而没有更加明确地指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特别是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列举这些个别的东西：(20)"（言语活动的普遍的）第一个特征，是依靠区别性并且只依靠区别性来具有生命力，而没有任何缓解，就像在任何时刻引入任何一个积极的词语就可以获得的缓解那样。（然而）第二个特征是，这些区别之间的关系，与其可以是的情况相比，'在每个时刻'都是极为有限的。30或40个成分。我们在此只愿意这样说：人们借助于30至40

个成分可以获得区分总数。让这些成分不能通过其自身就具有价值,这便是公理。30 或 40 个成分在无重大例外的情况下可以提供主要的材料。不过,对于语言来说,超过 30 或 40 个实体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从此,人们便[……]"(恩格勒,IV,3342,3)。索绪尔就是借助于这些突然打断的词语勾画出了符号学探索未来的规划。

但是,回过头来看索绪尔实际上留下来当作符号 - 语言学的首批已知条件的基本陈述,我们也可以断定,索绪尔当时意识到了我们刚才指出的存在于理论的各个不可分离的构成性概念之间的逻辑差距:

1894:(21)"两种东西,一种是在言语活动上的很好的普遍化,它可以使任何人感兴趣,或者是为了每[一天]的明确操作而可以向比较语法推荐的一种健康的方法,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恩格勒,IV,3297)。

1908:(22)"远在语言学之前,所有的社会科学,至少所有有研究价值的科学,最终也都可以出色地归约为心理学;这一点并不妨碍在普通心理学与这些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界线,而且,也不妨碍每一种科学都需要普通的甚至是集体的心理学无法提供的一些概念[……],目的在于不是在这些科学与我们一般的心理体系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之中,而相反是在它们所特有的和绝对是仅有的东西之中,既在语言的现象之中,确定表达的领域和构想规则"(恩格勒,IV,3330)。[我们顺便指出价值概念的普通性质,这种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本身就可以在社会科学内部界定一种类别]。

对于以逻辑的差距术语来表示的一种理论的这些总体表述,继贝特(他本身也依赖于索绪尔同时代的数学家佩阿诺[G.

Péano]和帕多阿[A. Padoa])之后(参阅帕多阿《论整数的一种代数理论》,*Essais d'une théorie algébrique des nombres entiers*,该书的前面有一篇有关任何演绎逻辑的导论,国际哲学会议图书馆,3,1900),重新被当代的认识论所采用。今天,一种科学理论的特征化过程(可以确定它所提供的对象之特殊性的能力)包含三种成分:

1、一种状态空间,该空间规定了理论应用的系统种类(我们的 A)。

2、一整套关于可变范围的基本陈述(我们的 B):

3、一种满足功能,该功能表现了理论在其数学模式和经验性试验结果之间的联系①。

这种表述方式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得到了应用,它说明,索绪尔在其将语言学当做自立科学②的活动中,确实曾经经历过两个阶段,同时让其弟子们——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关心充实第三个阶段,这一点经过欧洲符号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启动。

帕里安特的《言语活动与个体》(*Le langage et l'individuel*)(1973)是将这种观点应用于人文科学之认识论的第一次尝试。特别是关于《达·芬奇的童年记忆》(*Un souvenir d'enfance de Léonard de Vinci*)(弗洛伊德,1910)和由克里斯塔莱(W. Christaller)对于德国南部城市分布所做的研究(伊耶纳[Iéna],

---

① 勒鲁(J. Leroux)为《哲学概念辞典》(*Dictionnaire des notions philosophiques*, PUF 出版社,1990)所写的文章《理论》(théorie)。

② 由于有了这种限制,逻辑和数学理论都是一套有关一确定对象的陈述,该对象的所有模式都是同构的(并且是形象性的,因为它们具有范畴性的性质)。语言理论不属于这种情况。

1933)，作者指出，这些研究工作是怎样在一种理论制定工作中得到自立的，这种理论制定过程可比之于我们过去认为可以使其出现在索绪尔主义之中的那种理论制定过程(《言语活动与个体》没有分析符号学情况，而是限于对索绪尔有过三或四次的影射)：上面所引述的研究工作的可演示的科学性与理性，在于基础概念的正确等级划分和把握这种划分的元语言；这种科学性丝毫不取决于某种数字数值化过程或数学化过程。相反，我们还是按照帕里安特的论证，历史仍在期待建立一种理论形式，这种理论形式使他可以建立历史的理性主义(在巴什拉尔谈论"电化理性"的意义里)。

关于索绪尔，这种性质的观点应该使人得以在系统的总体经济学之中显示符号学方法的价值。因此，为确认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种顺序介绍方式而应遵循的步骤，在于证实这些建议恰恰是一些基本的陈述，并且还有其他的陈述。然后，就必须尽力指出，这些首批的陈述是怎样使这一些作用于那一些的，接着，人们将致力于解释这些首批的陈述在何处主导所有其他的陈述。我们在此仅提供几个短促的例证：

这样一来，陈述(1)，见前面页码，*[区别]*是与陈述(2)*[系统]*相连带的，因为所有的区别本身有时是相互有别的(而且如果人们最终能够制定出类型学的话[引文20]，那么系统就将会得到更好的界定)，这两个陈述应该借助于一种包容和等级划分系统而相互制约。如果(1)不由(2)所包含，语言就不可能形成。另外，对于想确信(1)、(2)和(3)*[任意性]*不可分离的人来说，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只须参照《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3页开头的第一和第二段就足可以了(因为根本没有哪一个词语形象可以比另一个词语形象会更好地回答它所负责说出的东

西，尤其明显的是，一个语言片段最后都只是在其与其他部分的不一致之中得以建立的，而不是在其他东西方面。任意性与区别是两种相关的品质）。

这同一个陈述（1）会导致区别性特征概念，虽然这种概念也并不恰恰是由索绪尔界定的，而是由布拉格学派所界定的，但它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是潜在的。

陈述（4）[二重性]主导着著名的二分法①，其对立的两项每一次都涉及到言语活动科学：

能指（signifiant）	对立于	所指（signifié）
形式（forme）	对立于	实体（substance）
内在性（immanence）	对立于	外在性（manifestation）
能力（faculté）	对立于	机制（institution）
语言（langue）	对立于	言语（parole）
聚合（paradigme）（"联想组"）	对立于	组合（syntagme）
共时（synchronie）	对立于	历时（diachronie）

显然，在这些二分法基础上，还可以指出另外三种原则的结合形式。例如，语言作为纯粹的系统，比较固定，因此和言语相比就不大是任意性的（根据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任意性"一词的意义，就是不大"随机的"，XXX），因为言语本身不大与系

① 它们的意义在图里奥·德·莫罗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版本中得到了很好的分析。人们还可以参照迪克罗（Ducrot）与托多罗夫（Todorov）合著的《言语活动科学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Seuil 出版社，1972。

统联系密切。

语言的线性属于历时性；语言是线性的，因为它在话语的时间里、在书写法的线性空间中像是一种不断的流体那样在表现。不能肯定，这种线性也可以借助于共时观点得到同样的验证，因为在共时观点中，刚刚谈过的那些难以分离的命题的集合，也就是说在当代为最小的言语活动行为而进行的心理过程的数目，似乎具有一种平面性的特征，它更准备好在空间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再现，这就像阿马凯尔在其著述的结尾处所做的那样（同上，第218—219页）。为了同一种原因，语言的内在性并不像表面性那样被符号的任意性所涉及，这一点对于将语言变成一种能力的观点（对立于在语言之中尤其看到一种机制的观点）也是真实的。

为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语言的逻辑组织（这是它的复杂的系统特征，即(22)“语言赖以不完全是任意性的一侧，在这一侧，相对的理性主导一切”）（《普通语言学教程》，107），我们刚才以这种方式列举了一些命题，这些命题构成了语言学的总的框架（这种框架几乎为索绪尔在1894年之后所勾画），在这些命题之外，一些内容广泛的疑问极力促使将这些发现维持在一种临时的假设地位之中，而没有让人们去进行公理式的探索。实际上，在读解直到现在发表的全部手稿评注的时候，引人注意的，是索绪尔身上存在着的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动力、一种纯粹的机能的顽强力量。

我们来想一想有关各种语言在以往时间中变化（获得与失去）的思考。从历时的观点考虑，语言的继续性创造很像是冰河沉淀物，即“人们在冰河畔见到的大块冰碛石，那是一大堆惊人的经世历纪的东西组成的一幅图画”（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

次报告会,1891;恩格勒,IV,3281,第5页):这样,语言的编码就像是随机的,并服从于一种永久的运动。但是,当人们过渡到共时观点时,就出现一种颠倒。这些同样的沉淀过程就不再像是流动的和随机的:在"社会结晶"的作用下——我们前面已经有机会谈论过,它们就变成了稳定的形式,这些形式由"相对的理性"加以规范,并且可以借助于一些总的规则而被掌握。根据所采用的观点,一个相同的问题空间就会获得与已经得到标注的特征完全相反的特征。

*价值*问题的提出过程,似乎遇到了一种可比较的颠倒观点。这尤其出现在恩格勒的著述中(1968,第259页,F丛书)(出自索绪尔手迹的文本也是有缺陷的):"*[价值]*。与任何*价值*都不可分离的东西,或者说构成价值的东西,'既不是'*a*)可以与构成一个*系统*的一系列相对立的单位不可分离,又*不是b*)可以具有[……]的,但这两种东西同时并不*可分离地*'是相互关联的'"。

按照第一个观点(a),符号的价值只能"被符号与语言的其他术语的关系和区别"(《普通语言学教程》,163)[①]从反面加以确定,但从在此是有缺陷的、然而是可以修复的另一个观点(b)来看,价值参与了符号的积极本质(同上,166),并在一确定的时刻和一确定的场所,以一个硬币的方式转换成一种观念,即一种意义效果,这是某种积极的东西(同上,160)。

① 例如,"法语的mouton(绵羊)可以具有与英语的sheep相同的意指,但不具有相同的价值,理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因为当谈论一块准备好的并端上餐桌的肉的时候,英语中说mutton,而不说sheep。Sheep与mouton之间的价值区别,就在于前者一侧有第二个词,这在法语词语中不是这种情况"(《普通语言学教程》,160)。

因此,大概可以指出,索绪尔从其一开始进行系统化努力就建立起的权威性和布局性的理论框架,很快就遇到了那些相矛盾的难以说清的对立状况,而这些观点则应该用于一种语言和多种语言的各种系统的不同构成成分:(23)“构成问题之困难的,是人们可以从多种方面来探讨这一主题,就像某些集合定理那样:在静态语言学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与里德林格[A. Riedlinger]的谈话,1909,见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29),或者:(23’):“我面对一种二难推理:或者在其整个复杂性之中来展示主题并承认我的所有疑虑[……],或者简单地做一做[……]。但是,就在还差几步的时候,我出于谨慎而停了下来……”(1911 年 5 月 6 日与戈蒂埃[L. Gautier]的谈话,同上,30)。

于是,使语言学理论得以开始和定向的大部分区分,好像是完全难以把握的,因为它们无法在“或/或”的或然选择方式(符号的可变性或不变性)上连接。相反,这些区分通过一种有张力的“和/和”的互补律来被主导①:语言将被说出**并**服从于一种永久的变化,**并且**永恒是这样的;这就足以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学。同样,价值将出现,**并**依靠其进入被概括的对立系统就像是纯粹的否定性那样出现,**并且**它依靠其在符号与“一种观念”的对换之中的作用,就像是对于整个机能的唯一的肯定那样。因此,这就要求语言学家进行一种不留情面的心理练习:从

① 人们会在《符号学的要求与前景》(*Exigenc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émiotique*)一书(献给格雷玛斯的文集汇编,1984)里安娜·埃诺所写的《关于符合词语的困惑》(*Perplexités à propos du terme complexe*)一文以及她所著《普通符号叙述学》(*Narratologie sémiotique générale*),PUF 出版社,1983)中,看到有关这种张力互补律概念的思考。

他应该理性地阐述的同一种现象之中获得两种不可并存的再现方式。例如,在语言变化的情况里,他应该将其想像为散在的、无序的和随机的,同时还要将其想像为规范的、调整好的、可理性化的。

在这些条件之下,在语言的机能中(24)"'成分和特性是相同的东西'。成分或特性是语言的一种'特征',就像一般任何符号学系统的特征一样,尽管在赋予一个事物以特点的东西与构成这种事物的东西之间在语言上具有区别"(恩格勒,IV,3328,XII),或者还像恩格勒所说的那样(1968,第276页):(24"')"由于语言不在任何其外在性上提供一种材料[……],(即实体),却只是提供具有生理的、体力的、精神的力量的组合的或'单独的'行动(action),而且由于我们所有的区分、我们整个的术语学、我们所有的说话方式都是依据对于一种内容的非本义的假设而定型的,所以,人们无法拒绝承认,言语活动理论的使命就是梳理我们最初的区分"。在对语言的这种令人晕眩的机能可以(按照苏格拉底的意义)"说点什么之前",首先必须同意在这种复杂性存在的准确抽象层次上面对这种复杂性(而不去对其进行过分的简化),这种层次即为首先由其区别性确定的特定逻辑关系的层次。索绪尔留给和加给其继承者们的,正是这种学问。

经过了几代研究者的努力,这位符号学家的这种复杂习惯才得以深入研究,因为一位单独的研究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实际的时间去探索。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够的。由于缺乏积累性的研究(当然索绪尔是其发起者),索绪尔没有能力从其实际上提供了"人们赖以起步的真理之界限(引文14)"的最初一些陈述过渡到他有意称之的规则和定理。但是,他创立了标记它们的

智力条件。因此,我们将根据介绍的需要在这个初步的总体观点之中不断地提及未能得到介绍的索绪尔的特殊概念。

现在,我们打算观察一下这种思想在整个世纪当中的演变情况,因为这些演变赋予了任何被称为"符号学"[①]的东西以形式。

---

① 叶尔姆斯列夫1943年在其《言语活动理论导论》(*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一书第一章结尾处写道:"只有一位理论家值得被称为无可争辩的先驱者:瑞士人菲尔南德·德·索绪尔"。

第二部分

从语言学到符号－语言学

第一章　路易·叶尔姆斯列夫或抽象进行的具体化方式

“活着，就是在捍卫一种形式”

——荷尔德林[①]

一、索绪尔的继承者

路易·叶尔姆斯列夫无法接近索绪尔手迹的全部，他对这位日内瓦老师的发现大概是通过其他渠道，而不是通过1939年以前的出版物。可是，他1943年出版的《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与乌达尔[H. J. Uldall]合作经过四年完成）指出，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完全依靠自己重新走过了索绪尔已经走过的一大部分路程。《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一书经常引述索绪尔的著述，但有时则将索绪尔的观点转述成非常个人的段落，这些段落无法依靠《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明确页码，但它们是对于索绪尔手迹的反应，这些手迹后来很晚才由恩格勒整理出版。例如，我们下面读一下它的第9—32页，而尤其是：

① 荷尔德林（Friedrick Hölderlin，1770—1843）：德意志诗人。——译注

第15页：(1)“一种理论正借助于一种完全形式的前提系统试图达到言语活动的一种特定结构的水平，这种理论必须应该在考虑言语(parole)变化的情况下，拒绝赋予这些变化一种有支配权的角色，并寻求并不扎根于语言之外的一种现实中的不变内容；这种不变内容可以使不论什么语言都成为一种语言，可以使一种语言在其最多样的表面显示之中仍然是其自身；这种不变内容一旦被发现和描述，它就被投射在任何性质的(身体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学的、本体论的)‘现实’上，以便使这种‘现实’围绕着一个参照中心即言语活动而形成秩序，它不再像是一种集合体，而像是其语言学结构成为主导原理的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援引自 Minuit 出版社版本，1971)。

第28页：(2)“这位(言语活动的)理论家以某些经验事实(尽管有必要对其进行尽可能的选择，但仍然是注定有限的)为基础，在一个明确的领域内进行了全部可能的计算。他从人们可以称为语言的所有对象中提取一些共同的特性，以此来任意地勾画这个领域，为的是进而使这些特性一般化和赋予其定义。从这时开始，他以一种任意的但却是适宜的方式，决定了理论得以应用的对象和不可应用的对象。这样，所有如此确定的对象就都服从于可以预示所有适宜情况的一种总体计算。这种计算是从已经提出的定义推导出来的，并独立于任何对于经验的参照，它提供了可以描述或辨认一个已知文本和描述或辨认这种计算得以建立的那种语言的工具”。

我们有着许多叶尔姆斯列夫借以明确地阐述他作为理论家的一套概念的文本，这套概念非常接近我们已经看到的索绪尔的概念；例如：(3)“在19世纪，言语活动的科学应该成为言语活动的历史的科学(语言学一词是出自大学使用习惯的)，只是

到了我们的时代,对于系统化的综合与探索才重新回到了首要位置,并由此产生了语言学一词,该词指语言的科学,而不是指语言的历史,但它却像是一种系统的和普遍的科学[……]。这位理论家为自己规定了纯粹语言学的但通常又是相当抽象的对象。他向听众灌输定义和术语[……],现在向您谈话的人自认为是理论家。您在此懂得了他的极限在哪里:他不是寻求永恒的玄学真实的哲学家。语言是其研究工作的中心。他的目的是将个别语言的特定特点与普遍性结合起来,是建立一种系统,以便得到一些既关系到行家(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语法学家)又关系到言语活动的哲学家的结果[……]”(《关于言语活动理论的讲话》[*Entretien sur la théorie du langage*,1941]见于叶尔姆斯列夫《新论文集》[*Nouveaux essais*],PUF 出版社,1985,第 69—71 页)。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研究这部极为抽象的作品。缓坡爱好者们大概会喜欢从面向广大听众的谈话或报告会的誊写开始,就像《言语活动的基本结构》(*La structure fondamentale du langage*)一书那样,那是 1947 年在伦敦召开的三次报告会发言的汇编。那些文本提供了有关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的详细概述,同时指出了一些错误问题,那些问题本应出现在 60 年代末西方形式主义者们对于非词语言语活动的非常新的问题表现出狂热的时刻。借助于信号灯、电话机盘和伦敦的大本钟,叶尔姆斯列夫明确地阐述了使他得以建立对于非词语的言语活动系统的符号学研究的牢固基础。

陡坡爱好者一下子就直取《言语活动理论导论》(哥本哈根,1943)。但愿人们能原谅我们不对这本书去假装进行方法学上的介绍:为了提出一个简洁的主题名单(为想进行探索的

人提供一种简单的读解指南），我们下面粗略地做出的直觉的和临时的内容切选，只是为了等待在对于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中有新的进展才出现在这里的。

该著述在介绍自己时（见第 12—13 页），就说它像是新的语言学的*初步之初步*的东西：(4)"对于这样一种语言学的初步研究工作，在于建立言语活动的一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和制定言语活动的前提，在于指出其方法和确定其途径。现在的研究构成了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叶尔姆斯列夫以忠实于索绪尔的言辞肯定了理论性的至上地位，随后，他阐述了（见第 33—48 页）他个人对于功能理论（见第 49—57 页）进行分析的观念，而这种功能理论也是他个人的：(5)"我们以处于其逻辑 - 数学意义和其词源学意义中间的一种意义来取用功能这个词，因为功能一词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所有科学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①。有人说，当两个术语是连带性的并且可以相互确定的时候，这两个术语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符号学功能。

在《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一书中，叶尔姆斯列夫随后便着手建立一种功能类型学。不幸的是，他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被认为是言语活动机制之基础的关系而举出的例证，不具备一种深度和可以与人们在索绪尔著述中找出的东西相比的一种新颖性。这些例证一般都是从最为传统的句子语法的支配现象借用而来的，尽管这种功能理论在内涵上带有句法教育学者的思想怪癖，这些怪癖暗在地引导从句与主句之间的从属关系，完全像

① 在实践上，这种由多种成分组成的起源，在叶尔姆斯列夫本身，为维护这个术语在其传统的使用（第 50 页）中所带有的含混性起到了作用，即便叶尔姆斯列夫的这个概念还处于荒芜状况。据我们所知，只有格雷玛斯曾试图在该词真正的逻辑维度方面使用过。

拉丁语法或希腊语法中的因果要求那样。因此，哥本哈根学派的功能理论在这个文本的空间中并不具备这种理论所带有的新颖性和延伸性。

接着，《言语活动理论导论》探讨了（见第58—104页）主要符号学功能，即存在于构成符号行为的两个面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表达与内容（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①]之间的功能。我们在扼要地介绍了《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的主要思考主题之后，还要在第二章中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可以给第16至第20章（见第105—128页）起名为"关系与数量之间的关系"。《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的这一部分探讨了在结构关系的等级上和在其循环性上的几乎是游戏性的自由度。它有着许多新创词（草草地在勾画一种"元语言"），并有力地肯定了关系的优先性：在不把研究对象想像成一组关系的情况下，进行这种研究是不可能的。

第129—143页处理了下列问题：一种有关言语活动的理论的真正对象是什么？何谓言语活动？如何将其与非言语活动区分开来？叶尔姆斯列夫顺便指出（第138页），一种语言具有可以翻译其他所有语言和其他所有非词语的符号学的能力。这种将语言当作"普遍的解释项"的表述后来被邦维尼斯特长时间采用（《语言符号学》）。继雅格布森之后，一些人认为意指只能借助于自然语言来掌握（例如，分析绘画就等于分析有关绘画

① 大概正应该从这些思考之中去寻找这位丹麦大语言学家最为丰富和最为创新的观点。尽管叶尔姆斯列夫本人提出过多种对其加以澄清的打算（尤其是《语言学论文集》的《言语活动的分层》一节，第44—76页），但在对其解释中仍存在着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的话语),这种表述后来可能为印证这些人的观点提供了帮助,以至于罗兰·巴特在建立"服饰系统"的时刻,他也不得不选定分析有关服饰的话语(是在服饰杂志上,而不是在服饰本身)。在此,我们从其起源上掌握了一个分叉点,该分叉点应该在欧洲符号学中于两个方面之间设立一种划分,一方面是继雅格布森和罗兰·巴特之后采用这位符号学家的这种"语言学"解释的符号学(sémiologie),另一方面是选定逐一考虑非词语的符号学而不打算隐喻式地将其处理成语言类型的符号学(sémiotique)。

语言的这种解释性能力,同样也是使所有的言语活动操作都成为可能和为谎言创造权利的东西(第 138 页)。至于言语活动和非言语活动的决定性区分标准,那就必须去寻找(见第 139—141 页)。一种言语活动被证实是一种言语活动,要具备两个平面,即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也要具备与这两个平面完全有别即一个不与另一个相符这样的条件。例如在信号灯的情况里,不需要区分内容与表达,因为表达(灯光的颜色:绿色、橙黄色和红色)是严格地逐项符合内容的(通过、缓慢和不通过)。因此,这里并不涉及一种言语活动。

《言语活动理论导论》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首先确保这个大部头但同时也是不可再补加的书籍的全球性推广(特别是借助于罗兰·巴特的《神话》一书)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了言语活动的与元语言相比较而存在的外延理论和内涵理论。有人后来区分出多种符号学(叶尔姆斯列夫以此定名通常所说的各种言语活动,自然语言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亚类型):

———一方面,外延符号学(sémiotique dénotative)是这样的一些符号学,其每一个平面无一是完整的符号学(sémiotique entière)(这种符号学本身包含着一个表达平面和一个内容平

面）。

——另一方面，是元符号学（métasémiotiques），其内容平面是一种完全的符号学（sémiotique complète），这是所有元符号学的情况，其对象（内容平面）是它们试图描述的一种言语活动。

——最后，内涵符号学（sémiotiques connotatives），其表达平面是一种完整的符号学。例如一部写于当代但却被认为是在古希腊时代展开的小说，它可以依靠一种其词汇、句法和节奏是从荷马史诗的译文中借用而来的写作方式而具有古代的内涵。这样，荷马史诗的语言（通过其内容与表达两个平面）就以内涵的方式指/古代的现实/这样的内容。叶尔姆斯列夫在内涵与外延之间所做这种对立的历史理由之一，无疑是它可以使对于文本[①]的情感和诗意层（个体和社会的共鸣）的不太理论化但更为直觉性的理论处理具有“语言学特征”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依据严格的审美观点，人们可以看到，在言语活动的重叠与包容（在叶尔姆斯列夫的著述中可以达到一种使人晕眩的程度）之中，显露出一种时代敏感性，在那个时代，它一方面表现为文学的或艺术的游戏，例如克诺（R. Queneau）的《风格练习》（*Les exercices de style*）（1947）所说的那样，另一方面在绘画上表现为波波瓦（Popova）和克里乌纳（Klioune）的形式上的层次。

二、语义组合的理论家

索绪尔曾经提供了可以将言语活动事实建立成研究对象的

① 无论什么样的文本：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教导，巴特在《神话》一书中已经将其同胞日常的品行（和经历）看做是一种文本。

概念框架，他找出了规则和固定内容，这些规则和固定内容可以让人将语言描述成(5)“在两种实体即内容和表达之间组织的特定形式，因此，这种语言就像是内容与表达的特定形式”。是我们自己强调了所引叶尔姆斯列夫这段文字(《语言学论集》，第44页)的最后部分，在这段文字中，叶尔姆斯列夫阐述了索绪尔，并最后超过了索绪尔，他就是以我们强调的这一点超越了索绪尔的，这一点同时奠定了对于内容事实即所指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至于索绪尔，他未能更多地考虑处理内容平面，在了解所指是否可以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和它们是否难以确定的问题上，他依旧是含糊的。

叶尔姆斯列夫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的大胆推理，值得逐步恢复和非庸俗化对待，以便我们可以重新感觉到这样的一种观念所再现的智力转换。我们将主要以《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介绍“表达与内容”的第13章为基础来进行阐述，同时我们确切地知道：

1、对于叶尔姆斯列夫来讲，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是问题的最后状态，因为在后来的著述中总是回到这个方面上来，为的是试图将其解释清楚。

2、这些观点越是程序化的，就越是难以确定。叶尔姆斯列夫曾经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建立言语活动的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但他自己从未完成。

3、可是，十一年后，他在美国杂志《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发表的《言语活动的层次》一文(后收入《语言学论集》，第44—76页)曾试图阐述清楚《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的启发，这种努力也不是没有用的。

1、继被语言学而尤其是音位学所推广的表达之形式观念之后，是什么可以允许从理论上提出内容之形式观念呢？——叶尔姆斯列夫从索绪尔的两种基本区分即在形式（forme）与实体（substance）之间和内容（contenu）与表达（expression）之间两种范畴关系出发，他的思想似乎未能停止过工作，因为他最终没有为索绪尔的这两种有区别而又各自独立的范畴分出等级。这种试图在经过推理而发现的形式与语言的关系之间进行推理式的连接的倾向，似乎在与索绪尔相对立的情况下为叶尔姆斯列夫的科学想像赋予了特征，而在索绪尔的想像中，充满了分离、散乱、格言[①]、并列。在叶尔姆斯列夫的著述中，将表达对立于内容置于形式对立于实体之上编排，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大杂烩"，而首先是借助于等级化进行的一种安排，并且，这种安排有时以明确的方式包含着索绪尔的第三种区分即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对立起来的区分。

叶尔姆斯列夫在考虑索绪尔主义中被临时独立介绍的这两种范畴的四个术语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被似乎存在于由这四个术语所产生的关系之间的类比关系的力量所控制住了。但是对此，人们必须首先承认，表达对立于内容这种区分比形式对立于实体这种区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语言学论集》，第 52 页）。换句话说，应该首先区分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然后研究这两个平面中的每一个是否与形式与实体之间的区分（因此从等级上

---

① 由此，从想像上讲，唯一被认为需要确定的对立性之标准就很难把握了，不论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单位方面（源于类似于大对立于小这种型式的析取对立关系），还是在其著名的二分法方面（取决于语言对立于言语这种型式的互补性）。如此进行的分析只能导致一种事实的分散。叶尔姆斯列夫过分地是逻辑学家了，以至不能不判定这种方法是难以把握的。

来讲是低的）有关。这样一来，这两种范畴的四个术语就可以写成具有特性的成对形式：

——内容之实体和内容之形式；
——内容之形式和表达之形式；
——表达之形式与表达之实体。

叶尔姆斯列夫也称这三个连对为三个“层次”，他在它们之间观察到，同一种关系在实现三次：(6)“我们现在主张的论点之一，在某些方面包含着在内容之实体、表达之形式、表达之实体三者之间的一种类比关系”。这种类比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了更扼要地阐述叶尔姆斯列夫的依然是极为复杂和抽象的表述（《语言学论集》，第67页和后面的页码），我们将认定这种类比每一次都来自于是表面的各种关系：

——**表达之实体表现表达之形式**；我发出/po/的声音，喇叭筒加以扩大，录音机录下了某种发声实体的有形性，在这种有形性中，可以借助于抽象而辨认出属于法语的两个音位，这个/p/明确地区别于/b/，所有的法国说话人都会直接地认出它们来（但西班牙人不必做到），同样，/o/是一个法语音位的表现形式，它严格地区别于/a/和/u/。因此，实际上传播的声音（实体），表现出法语所专有的表达之形式的非常好辨认的组成成分。

——同样，**内容之实体表现内容之形式**。这就是艾吕雅[①]

① 艾吕雅（Eugène Grindel，笔名 Paul E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译注

的诗句的情况："曙光点燃了泉水"（借用拉斯捷[F. Rastier]的例子，1991，第202页）。内容之实体（表现为原句诗中三个实词和两个冠词所引起和所带来的一切东西，在艾吕雅看来，如感觉、联想和回忆）表现（和组织）内容之形式的下列成分：/流动/、/明亮/、/纯净/、/过程/等，这些为数不多的成分将确保对于这句诗的整体的可读性。

——最后，也还有一种存在于**内容之形式与表达之形式之间的关系**，但这一次，是一种可逆的关系：人们更习惯于在"表达之形式表现内容之形式"这样的意义中考虑外在关系（rapport de manifestation），而且这种观念构成了雅格布森的分析基础，但是人们也在电话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出"T 就像 Théodore 中的 T，D 就像 Dieudonné 中的 D"，这两个专有名词的内容之形式服务于区分音位/T/的形式与音位/D/的形式。

于是，叶尔姆斯列夫就从这三个连对中得到了外在关系的固定成分；而在他看来这一点就构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层次化，即在意指的心理面与物质面之间操作着著名的符号学功能的那些神秘的协调作用之可分析的表现，他认为，符号学功能就是严格意义（《语言学论集》，66）上的符号学研究领域。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符号学是怎样大大地超过了这一范围，但似乎是极为严格地超出的。

我们将顺便指出，在这种背景之下，<u>形式</u>更属于语言，而<u>实体</u>则更属于言语，因为形式是"语言"建构的固定成分，就像它是被社会所结晶化了的那样，而实体似乎更属于言语的个体变化成分即由个别的或集体的参与者所选定的具体的和特殊的品质。因此，索绪尔的两个发现即"言语是语言的表现，实体是形式的表现"，就再一次加强了人们对于常识的确认，即表达是内

容的表现。然而，表达对立于内容这一范畴，高于(《语言学论集》,52)形式对立于实体，并通过多种因素决定后者。正确的表述恰恰是：表达之实体是表达之形式的表现，因此，内容之实体是内容之形式的表现。

在这种类比关系和叶尔姆斯列夫用来说服自己的方式里，有一种"明显的"推理形式[①]：这种推理本身就显示了一个位置即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假设内容之形式的存在就合乎逻辑地变成必要的，这完全就像假设上帝的存在在笛卡尔那里合乎逻辑地是必要的一样。

2、在总的意义之外，可以具体地显示内容之"形式"和"实体"吗？——叶尔姆斯列夫对于形式与实体的考虑，使他以另一种方式摆脱了索绪尔。在索绪尔看来，实体，不论是语音上的还是智力上的，都是无个性的连续体，而在叶尔姆斯列夫看来：(7)"实体仅仅取决于形式，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借给它独立的存在方式"(《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68页)，因此(第70页)：(7')"我们在语言的连续之中、在其过程之中看到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即内容之形式，这种形式独立于它与之有任意关系的意义，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形式转变成内容之实体"。因此，内容之形式和实体自然就属于语言学，而意义则躲避语言学。形式与实体是可以分析的，因为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具有形式，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关系网的产物。可以假设内容之实体也(异乎寻常地)是一种可以分解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必须想像那种允

① 大概可以比之于笛卡尔《第二哲学沉思录》中对于上帝存在之证据的解说，就像博尔德隆(J. F. Bordron)所分析的那样(PUF出版社，1987)。

许进行这种假设的东西呢?

一方面,根据我们刚刚提供的引文,上述实体从为其奠定基础的形式来说,就像是模式。但是,另一方面,根据《语言学论集》的观点(第60页),语言学的内容之实体的形式就是被每一个语言共同体用来进行集体评价的结果,因此,它是它放置在词汇学的词汇中和这些词汇的连接规则中的某种社会舆论。我们举"迷恋"(engouement)一词为例:由于与内容之形式有关的限制,我不能说:1)L'engouement mange(迷恋在吃);由于不太抽象的评价方式的限制,我不能写:Un engouement est un goût modéré et objectivement justifiable(迷恋是一种温和的和客观上可以验证的爱好),因为内容之实体由于从社会意义上讲与"迷恋"一词有联系,所以相反包含着对于不值得一提的一个对象的过分爱好。最擅长使用语言的诗人,都不得不考虑内容的这些区别性的、因此也是断续的特征,尽管是强加给他的。

因此,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说法,借助于因连接和具有形式而可以辨认出的这两个方面的对立,(8)"意义本身也无法接近认识,[……]因为它本身也是无定型的,也就是说它还没有服从于一种定型过程,[……]它不具有界限"(这仅仅是对于《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98页内容的节选引述)。因此,被感受到的意义(sens)[①]恰恰是不可分析的连续体的领域,而人们应该无区别地谈论内容的意义和表达的意义(《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74页)。

---

① 该丹麦词在英文上的译文是 purport,在法语上的译文是 matière 或者 sens,这些译文已经得到了叶尔姆斯列夫本人的同意(《语言学论集》,58,n,1)。我们采用的译文是 sens。

这一切之主要和异乎寻常的结果，是允许甚至规定对于所指的分析可以在不考虑所感受的意义的情况下去进行。恰恰是这个观点（非常之新，并且要求一种长时间的实践，以便最终被接受）在提供任何符号学事业的起点：一种将不考虑意义的对于所指的分析（但仅考虑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各种形式上的、可以从形式上加以确定的方面）。

有一种困难继续存在着，它可能就像一种矛盾出现在叶尔姆斯列夫非常严格的演示之中。为了进行这种思考，根据一种渐进的和演示性的令人惊奇的方式，同时也考虑到主题方面的新颖和困难（《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 87—97 页）[①]，这位丹麦学者以下列词语提出了问题：(9)“一种被证实是正确的经验在于比较不同的语言，然后从中提出对于这些语言是共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则对于所有的语言都是共同的，不论人们考虑的语言数量是多少[……]。人们发现，这个共同的成分就是……意义即以一团无形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思想本身”（同上，第 68—69 页）。为了说明这种观念，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了不同的语言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切分“不知”这个“意义区域”的。如果我们一项一项地解述英语、丹麦语、芬兰语和爱斯基摩语说“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的方式，我们就会得到爱斯基摩语的“non - sachant suis - je - cela”（“不知我这个”）、英语的“je suis certain de non savoir”（“我确信不知”）、丹麦语的“je sais le nullement”（“我知道毫不”）和芬兰语的“non - je sache”（“不我知

① 这一段内容绝对需要读一下，它提出了内容之形式现象的一种非常简单和非常直接的经验。我们在其他地方对其进行了介绍（《符号学赌注》，*Enjeux de la sémiotique*，第 21—28 页）。

道”)。这个小小的游戏可以使人很具体地感觉到,意义是怎样根据不同的语言来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安排、连接和形成的:而意义似乎是固定的,内容之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变化(这个很有限的例子不大适宜指出内容之实体之变化,除非有人很想中断表达的自动性而想到法语中的“pas”①在很古以前就是一个“pas”②,而“ne…mie”③中的“mie”就是一小块碎屑,并且似乎没有意义的英文助词 do 有可能保存住对于肯定程度的强调的痕迹)。因此,对于同一种思想结果即同一个意义如此汇集的内容之实体与形式,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是完全无法预见的。

相反,不论所指之形式和其实体的特殊性与相对性是怎样的,意义将是同样的,并且可以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尽管有着置其于度外的形式上的变化。(10)“一切都像是同一堆沙砾,它们可以形成不相似的图画,或者像同一块云彩,它可以经常地变换成新的形式,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在形式或结构上可以不同”(第 70 页)。

在此,一个基本的逻辑反应,就是要求对这样的论断提出异议,即唯独某种切分(因此就是一种形式)可以决定同一个意义,并借助于即便是笼统的命名来鉴别这个意义。叶尔姆斯列夫对于这种异议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这里涉及到另一种类型的一种切分,它是不能分析的,并且不能组成很容易孤立的单位,就像主导着语言的形式连接的那种智力切分一样,但是,它

---

① 否定式短语 ne…pas 的第二个成分。——译注

② 名词:“脚步”之意。——译注

③ 古代法语:等于否定式短语“ne…pas”。——译注

却是综合的和组成集合单位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一种仅仅是感觉性的切分。这些不可分解的因此是连续的“意义区间”——正像叶尔姆斯列夫所理解的那样，会依靠一些“形式”，因为这些形式会按照格式塔理论[①]依据其感觉性区分的特性提供给直觉，而与对于“实质”的未区分性形成对比。例如韦特海默(Wertheimer)1912年的感觉经验；叶尔姆斯列夫在赋予索绪尔的研究以语言学格式塔性质的时候，也间接地谈到了格式塔理论(《语言学论集》，第78页)。

我们还是回到叶尔姆斯列夫所举的“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如果人们选择总体的感觉的话，那就差不多所有的语言说的都是“不知”之意，但是由于这些语言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所以这就不再真正地恰恰是同一个不知，并且分析提供了准确地体现、定性和确定这种区别的手段。

因此，应该做这样的结论，叶尔姆斯列夫在对于意义的总体感知与对于意指的生产和分析的规范性工程之间划了一条沟。在根本不否定前者的情况下，就像人们有时指责他的那样，他将其从言语活动的理论中排除了出去，而将其看作是语言学之外学科的对象，诸如社会人类学或哲学。在这一点上，叶尔姆斯列夫的决定，是彻底搁置整个感知领域，以便依据索绪尔的发现来决定性地进行一种大胆的演绎工作。(经验论原理，《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19—22页)。因此，在语符学(glossématique)看来，过问内容的组织情况就等于过问A——感知[即叶尔姆斯列

---

① 格式塔理论(théorie de la Gestalt)：即完形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不反对自我观察，尤其重视直接经验和强调整体性，但反对将意识分析成为简单的单位如感觉、意象等心理元素。——译注

夫的意义:在这种感知之中,自然需要记录内在的目光和直觉])、B——对于意义的求助[就是叶尔姆斯列夫的内容之实体]和C——范畴化活动[就是叶尔姆斯列夫的内容之形式的组成成分],同时考虑只去关照B和C,因为它们是真正的言语活动仅有的活动。

至于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他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途径,同时拒绝了对于感知领域的这种推理性判断(époché),并相反从A即从对于感知的系统挖掘开始。符号学的未来是否要经过对于感知、可感知和被感知的东西(以新的努力)进行挖掘呢?不论怎样,确实,认知研究已不能代替一种感知理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不排除当前对于激情符号学所做的最新研究(参阅《符号学》一书,第三部分《巴黎符号学》)可以带来某些可探讨的概念,从而可以在某些情况里将"被感知的意义"描述成一种否定性、一种意义期待、一种空缺,并且对于"接收"这种意义的主体来说是很有价值的①。

有一种观念,认为符号学问题的下一个阶段将必然借助于哲学思考而包含一种迂回,而在整个世纪过程直至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刻,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符号学都只是在禁止任何涉足哲学的情况下取得进展的,是否必须接受这种观念呢?叶尔姆斯列夫本人曾明确地给予了答复,就像当年索绪

① 人们可以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发现对于距离的一种实际说明,这种距离可以存在于笼统地被感知的意义与对于内容之形式和实体的安排的细微计算之间;他曾经说过,在他看来,整个《巴玛修道院》一书就是试图重新创造由勒·科莱日(Le Corrège)绘画的某位圣母在他身上激起的那种快乐(同时具有满足感与缺失感)。

尔所做的那样，同时尽力参照维也纳学派而尤其是卡纳普[1]（《语言学论集》，第40页、41页）的研究工作为其研究确定位置。尽管他在卡纳普的科学想像与他自己的逻辑认识论（他的认识论有时似乎在以科学的现代性为名与莱布尼茨[2]的设想联系了起来）之间整理出许多联系，但这位丹麦语言学家仍然拒绝进行哲学探讨，为的是死守对语言和所有系统进行研究的严格的领域，因为在索绪尔所考虑的符号学内部，这些系统都可以被视同为语言。

3、**内容之形式的组合。**——内容之形式的现实性一旦被人接受，下面的阶段就在于按照不同的单位来分析这种形式的特定连接了。是什么在此起作用呢？是将言语的令人晕眩的多样性即符号的无限的数量引导到数量不多的——因此是有限的——基本单位即意指原子方面的可能性，叶尔姆斯列夫将这些基本单位以一个很宽泛的词定名为“形态”（figure）。每当需要建立对于一个文本的具体的总体看法时，正是从无限到有限的这种减缩在证明内容分析的合理性。

（11）“操作的方式对于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是完全一样的。就像在进行该分析时人们可以将表达平面分解成一些相互间有关系的组成成分那样（就像经验性地出现在字母的发明与音位的现代理论之中那样），人们也应该借助于一种相似的分析将内容平面分解成具有相互关系的比符号的最小内容还要小的一些组成成分”（《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88页）。

---

① 卡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1）：德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② 莱布尼茨（Wilheim 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译注

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例子(从此,该例子便被世界上所有试图转达他的思想的人们所敬重地重复),关系到veau(小牛)、vache(母牛)、taureau(公牛)、boeuf(牛,总称)、étalon(种马)、jument(母马)、cheval(马,总称)、homme(人,男人)、femme(女人)、(儿童)(等等)的内容。人们在它们中将不能保留小牛、母牛、公牛甚至女人这样的组成成分:因为它们都可以各自重新写成:elle－boeuf(她—牛＝母牛)、il－boeuf(它—牛＝公牛,在小牛的情况下可以写成il－jeune－boeuf[它—年轻的—牛＝小牛])、il－cheval(他—马＝马)、elle－homme(她—人＝女人,在是"小伙子"的情况下,写成il－jeune－homme[他—年轻的—人＝小伙子])①。

因此,就像应该是的那样,分析来自于从复合体到单体,同时借助于替代(commutation)来证实越来越小的组成成分的存在和这种分解的基础。在此,我们将不强调替代的定义,它是语符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通过这一"元语言"的整体来严格地确定的,我们将局限于重提叶尔姆斯列夫称之为"实际定义"(《言语活动理论导论》,第94页)的东西:(12)"语言的一个平面的关联,在当其与语言的另一个平面的关联确定有关系的时候,将被称为替代"。具体说来,替代是从音位学借用而来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参照下一章)。人们可以显示,/peau/②这一表达至

① 条件是可以将人、牛看作是属的内容单位,它们服务于将il－homme(男人)(在拉丁语中是vir)、elle－homme(女人)、il－boeuf(公牛)、elle－boeuf(母牛)看成是从它们派生出的组成成分[这一切都是以演绎的、因此也是独立于一已知语言中真实地存在的词汇的方式]。

② 其发音为/po/——译注

少包含着/p/和/o/两个音位单位,/peau/不同于/beau/[①],/peau/不同于/pas/[②],而/beau/不同于/bas/[③],因为表达平面的这些变化每一次都会引起内容平面的相关变化。同样,如果人们在考虑属于同一意义领域[④]的一套词汇的时候,就像上面的例子那样,那么,人们就可以对于存在于公牛—母牛、种马—母马这四个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并且显示它们每一个至少包含着两种内容单位,因为:

1)公牛对于母牛的关系就是公马对于母马的关系:一个/il/[⑤]相对于一个/elle/[⑥];

2)公牛对于公马的关系就是母牛对于母马的关系:/牛科/相对于/马科/。

这样的一种做法,虽然后来被认为是不大完善的和可批评的(参阅迪克罗与托多罗夫合著《言语活动科学百科词典》中的"替代"词条),但在当时却在显示内容之形式的这些连接方式方面起到了作用。即便这种做法难于按照叶尔姆斯列夫设定的严格性来应用,因为内容的这些连接方式并不以在相反的顺序中出现的同样的自动性表现在表达的平面上——在相反的顺序

① 其发音为/bo/——译注

② 其发音为/pa/——译注

③ 其发音为/ba/——译注

④ 同样,音位比较只能在属于同一语音类别的一些词语之间进行,因为人们只能比较可以比较的词语;要保证有某种实质的同质性,以便这些词语明确地是可以接近的。

⑤ 阳性人称代词。——译注

⑥ 阴性人称代词。——译注

中，不引起语义变化（内容平面）的一个语音变化（表达平面），则不被视为是替代性的，但是，这种做法还是获得了世界性的巨大成功，并引起了一些语义学家们的广泛爱好，因为他们都明显地服膺于这些对于显示现实是如此具体的操作方式，而现实直到当时仍被认为是无形的。

叶尔姆斯列夫在这部奠基性的著述之后（完成于1934—1943年），便开始为这种做法制定不可避免的界限（《言语活动理论导论》，92）。他只在各种语法工具的语义中（如在小牛—母牛—公牛的例子中的/il－elle/范畴中）真正地发现了建立这些最小符号的界限名单的可能性，因为语法工具的范畴无论如何都被语言的结构本身所限制住了。

三、语言代数学

叶尔姆斯列夫邀请科学界都来参与这一事业，当他采取对于这一事业的总体观点的时候，他以下面的方式来概述这一事业：（14）“与传统的语言学相反，这里形成的语言学，其表达之科学将不是一种语音学，而其内容之科学也不是一种语义学。那么，这样的一种科学将是语言的一代数学，它在非定名的单位上操作——也就是说这些单位是任意定名的，而不需要它们具有自然的定名，并且它们只能通过它们与实体的联系才能获得有动机的定名”（《言语活动理论导论》，101—102）。

《言语活动理论导论》在丹麦出版十五年后，其英文版才问世。格雷玛斯说他在读到这本书时就像是有一声霹雳打来，这声霹雳也震撼了罗兰·巴特，因为他们一起发现了叶尔姆斯列夫（《对话》见《诗》（*Versus*）杂志，43，米兰，1986，第42页）：在

枯燥的思考之后，他们都为由这种概念的纯粹性所引起的美而惊讶。

叶尔姆斯列夫自己也将这种概念之美变成了他多次报告会的结论主题。(《关于言语活动理论的谈话》，见《新论文集》，第86页)："这显然妨碍不了我去想望美。因为这种纯粹的和客观的科学是一种对于美的想望，正像数学家亨利·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所说的那样：在谈论寻找美的时候，这种美被理解为'各个部分间和谐的秩序和对于世界的和谐之感觉'，我喜欢这种更为深在的、更为高贵的美，而不大喜欢进行更为表面的审美研究"。

我们在这一部分开始时安排的荷尔德林的铭文"活着，就是在捍卫一种形式"，根本不是叶尔姆斯列夫所承认的座右铭，但它却与这位丹麦大学问家的语符学相距不太远。这种语符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于是，皮亚杰[①]在其列为"我知道什么?"丛书的《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1968)一书中用三句话抨击叶尔姆斯列夫，其结论是："但是，他的结构主义仍然是静态的，因为他强调了'隶属'，而不是转换"(第68页)。皮亚杰完全不了解叶尔姆斯列夫，原因是当时正在经历的转换语法学潮流所引起的视觉错误造成的。

一种真正的尽管是审慎和有礼貌的争论，使雅格布森与叶尔姆斯列夫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处于对立状态。叶尔姆斯列夫曾在1928年海牙会议上听到过布拉格学派论文的介绍，在惊异赞叹之余，他又为雅格布森在惊人才气掩盖下的缺乏严格性而感到心灰意冷(布隆达尔[V. Brondäl]也称其为"天才的雅格布

---

①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译注

森”），而在某些谈话场合，雅格布森也非常光明正大地承认，对于他来说，哥本哈根是一个智力上的严谨学派（《与波莫尔斯卡的对话》[*Dialogues avec K. Pomorska*]，Flammarion 出版社，1980，第 40 页）：“我要真诚地说，关于方法论的这些争论教会了我在我的定义中要更注意严谨，以便不非法地用一些绝对的实质价值来代替真正的科学所要求的严格地是相对的术语”；相反，他却被公认为比丹麦人更富有艺术意识（《假设》[*Hypothèses*]，第 41 页）。叶尔姆斯列夫本人反对布拉格派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对于“语义的音位化趋势”（《语言学论集》，第 124 页）的担心，这种音位化趋势表现为一种总体的和演绎的方法，而尤其表现为一种破坏性的二元对立过程，因为这种趋势有利于带有两项的析取性对立，而排除参与性对立。（关于这些问题，请参阅齐尔贝尔贝格的著述《意义的理性与诗性》[*Raison et poétique du sens*]，该书第 3—40 页和本书下一章）。

除了个人的热情（这种热情正在与其主角人物一起消退隐没）之外，欧洲符号学目前的发展（请参阅乌蒙勃托·埃柯的《符号》[*Le signe*]一书，1988，第 90 页及后面几页）承认叶尔姆斯列夫的概念（上述《诗学》杂志，第 44—46 页）“为符号学理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并为所有的社会科学建立了一种参照模式”。

第二章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普洛普与对于口头民间故事的研究

与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或皮尔士相反，俄国"形式主义论者"普洛普并没有以语言学或符号学抽象的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仅仅是在几位西方研究者（列维－斯特劳斯、巴特，还有格雷玛斯）于他的著述出版三十年后阅读了他的著述，他才被补认为是符号学人选严格的先驱者队伍中的一员。确实，这位著名的民俗研究者曾经断然地将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置于科学性之名下（这种考虑经常出现在他的解释之中，尤其是在第6—27页中），但是，他也选定以逗人喜爱的语气来自我表述，并决定赋予这本书（它是对于一项先前进行的分析工作所做的扼要的科学报告）一种对于普遍都关心的事情的论述姿态。由此，产生了与阅读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成果完全相反的阅读困难：《民间故事形态学》读起来太容易了，对俄国文化历史不太了解和不大了解这样的一种研究工作的历史和科学背景的一位读者，有可能不了解它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对于构成《民间故事形态学》历史背景的智力探索简单介绍一下，以便能够重新建立在普洛普于巴巴－加嘎

(Baba－Jaga)或瓦西里萨(Vassilissa)[1]的幻觉中很好地分离出来的一般木偶戏背后起作用的东西。

《民间故事形态学》通常被认为是俄国形式主义论者们在散文[2]上、更准确地讲在叙事理论上的最为成功的例证。然而(但这是否真正是谬论呢?),普洛普却不是第一批形式主义论者:似乎他根本没有参与1915年莫斯科语言学派的创立,也没有参与1916年圣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协会"(OPOIAZ)的创立,这两个组织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活动中心。对于莫斯科语言学派初期,除了那些作为同路人的未来派诗人[3]如柯列布尼克夫(Khlebnikov)和马雅可夫斯基之外,人们所能记起的还有博加蒂列夫(P. Bogatyrev)、雅格布森、维诺库尔(G. Vinokur)或布里克(O. Brik)(1888—1945),而在圣彼得堡,除了那些与博杜安·德·库特奈接近的语言学家,其奠基者尤其是施克洛夫斯基(V. Chklovski)和埃肯博姆(B. Eikhenbaum)(1886—1959)。

普洛普也不是第二批形式主义论者,这第二批属于扩大的和温和的一组人,他们懂得超越初期未来派诗人们的吵闹、他们的格言和他们辛辣的口号,为的是确保一种能力和一种大学教学的联系性:普洛普并不属于彼得格勒国家艺术史学院(1920)

---

① 巴巴－加嘎和瓦西里萨均为普洛普所选故事中的人物。——译注

② 在西方文学体裁的划分中,小说也属于广义的散文体作品。——译注

③ 形式主义论者们注重探索词语艺术的方法与技巧,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遇到了未来主义诗人、特别是克鲁塞尼克(Krucěnikh)、卡门斯基(Kamenski)和布里尤卡(Bourliouk)的"创造性歪曲"和"脱离意义"的试验。这些实验真实地检验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多样性,这种关系,叶尔姆斯列夫几年之后将其定名为符号学功能,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关系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科学的唯一对象。

的创始人之一。

最后，他也没有被卷入1922年由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冈[P. S. Kogan]）出于预防性的警惕而掀起的首次意识形态批评的漩涡。我们知道，这样做很快就发展成由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Littérature et Révolution*，莫斯科，1924）和布哈林（《关于艺术中的形式方法》，*Sur les méthodes formelles dans l'art*，1925）等政治活动家发起的立场鲜明却钻牛犄角尖式的指责。托洛茨基认为，形式主义方法是非介入式艺术的方法，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方法，是在假借由马克思主义辨证法所规定的现实主义审美的名义。在他看来，形式主义论者们都是新康德主义者，属于唯心主义。他们难道不是在将艺术的形式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历史的实体吗？他们难道不是在建立时间性的长久的结构吗？从断言精神的自立，到相信超自然和相信宗教，只有一步之距："形式主义论者们是圣·让[1]。他们认为开始就是行动。动词紧随着行动就像是其语音的影子"（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83页，见于埃利克[V. Erlich]的引述，第104页）。

普洛普积极地参与了形式主义思想家们借以形成其学说的这些激烈的争论了吗？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我们很难确定这个问题。在普洛普写给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信中，他甚至不承认是形式主义论者，并鄙视地将这一称号用在了一些僵化和无能的研究者身上（埃诺底[Einaudi]，第211页）。他更将自己首先看作是结构主义论者。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普洛普面对形式主义团体的影响而保留了个人独立性。在

---

① 圣·让(Saint Jean)：印刷业守护神。——译注

他看来，这并不妨碍与形式主义论者们的智力方向严格地具有共同之处，从而形成一种方法和一些原理，而那些形式主义论者们也是极为困难地接受着这种称呼，因为这一称呼也是他们的诽谤者们强加给他们的。

在民俗学的更为学术性的（因此是更为平静的）空间里，普洛普继续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他于1927年完成了他的研究工作，并被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艺术史学院于1928年出版。该著作于1958年被翻译成英文。于是，列维－斯特劳斯用英文和法文写了他的《结构与形式——关于普洛普著述的思考》（1960，后收入《结构人类学》，第二卷）。正像这篇论文的题目所说明的那样，列维－斯特劳斯的构思，是将形式主义与延续和超越了它的布拉格结构主义相比较，进而阐述形式主义。该书的译文和介绍在美国和西欧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在简明的《故事形态学》之后激起众多"叙事分析"的继承者。

普洛普是这一运动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吗？难道不该想到，有些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形式主义著述由于从未被翻译或从来就没有出版而（也许是临时地）没有露面吗？普洛普本人后来也蒙受了严格的意识形态的监督，而不得不部分地修改了他的著述，并于1969年出版了新的版本：在法国流行的1970年的版本继承了规范后的新版本，而1966年出版的意大利版本（埃诺底）则重现了1928年的文本。

历史的偶然性无情地为形式主义的这种启发性传播打上了烙印，这种启发大概还不大被人所了解，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应该强调一下一部重要著述的资料性和概念性价值，那就是维克多·埃利克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

[耶鲁,1955,在 Mouton 出版社的版本中为第 311 页,海牙,1969],尽管它是先于普洛普的文本在西方传播之前写作和出版的,但它一直具有现时性)。

一、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

在试图对《民间故事形态学》做扼要介绍(这种介绍将显示该书所代表的符号学研究的内容)之前,甚至在尽力较为准确地确定形式主义学说是什么之前,我们先大体地回顾一下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和它借以在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中延续的方式。与索绪尔主义(索绪尔主义曾极大地强调了言语活动的纯粹形式的本质)和源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Recherches logiques*)(1900)的德国形式主义相比,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运动。

胡塞尔《逻辑研究》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标志着对于人类言语活动的逻辑学研究在强有力地反弹,这种研究已在 19 世纪几乎全部中断了,原因是建立在历史方法基础上的语言学取得了进展。(历史学方法当时掌握着科学研究的垄断权)。对于在纯粹逻辑方面的研究,一些思想家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传播这样的想法,即对于思维的所谓持久和普遍的形式之经院式的讨论无任何意义损失,并且逻辑概念是经验的、相对的、变化的。胡塞尔重新提出,逻辑是形式的,而不是实体的、普遍的和必然的,并敦促在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各种经验性材料中研究言语活动的普遍语法(《逻辑研究》,II,第 294—342 页),他这样做为当时的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本书的出版想必在德国研究者们当中引起了一种

划分，一方面是（经验式的）“心理学家”，另一方面是“形式主义论者”，后者认为（比如莱布尼茨），应该区分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偶然真理和必然真理。（这些都在恩斯特·卡西尔的《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一文中重新得到了介绍，见《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I，2，1945）。

在胡塞尔的俄国弟子居斯塔夫·斯佩特（Gustave Spet）的推动之下，莫斯科的青年语言学家们开始熟悉“形式”对立于“内容”和“符号”对立于“指代物”这些概念。他们也采用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概念，而且与博杜安·德·库特奈及其学生相反，在彼得堡，他们没有从其研究之中排除求助于心理学式的解释，但他们坚定地申明是反心理学主义的。

但是，虽然20年代于俄国形成的思考和宣告并非确实与当时的气氛（即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研究状态）毫无关系，可这些钟爱抽象的人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不同的和特殊的领域。不该由我们来描述苏维埃革命和为这场革命做了准备并伴随着这场革命的文化方面的酝酿。但是，各种类型的证明，特别是艺术家和作家们的证明（包括康丁斯基[Kandinsky]的《回顾过去》[*Regards sur le passé*]和贝尔贝罗娃（Berbérova）的《我在指出》[*C'est moi qui souligne*]），都丰富和使人感觉到了当时在俄国两个首都出现的智力激情、概念冲动、世界观的彻底改变和想像力的炽热。由此产生了一股特殊的灵感，它经历了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的形式主义事业，直至这些思想家和创造者被一种“意识形态的卡诺萨”①所粉碎（这是

① 卡诺萨（Canossa）：意大利的城市名，德国皇帝亨利四世曾到此向格雷古瓦七世教皇请罪。——译注

清洗运动的一位参与者戈尔巴切夫[G. Gorbatchev]说的话，见《*Zvezda*》杂志，*1930*，第 *5* 期：*My escë ne nacinali drat' sja*）之前。*1934* 年，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没有争论，而只有对于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讨伐（甚至包括对于弗洛伊德主义的讨伐）。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一定数量的"理论"文本，从 1965 年开始在法国有所出版和发表（特别是在《交换》杂志[*Change*]、《诗学》杂志[*Poétique*]和论文汇编《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中）。《文学理论》一书中的两篇文章：施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就是方法》（*L' art comme procédé*）和埃肯博姆的《形式方法的理论》（*La théorie de la méthode formelle*），以及后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形式主义者》（*Les formalistes en question*）（1924）（见科尼欧[G. Conio]的著述，1975），都对这些观念有过介绍。

使用一般文学教材的人，通常都是大学文学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如果他们读了这些文章，他们是会失望的，因为他们只会发现对于区分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的传统的和非常学院式的提问。现在，我们尝试通过施克洛夫斯基和埃肯博姆两或三个表述方式来显示它们的动力，因为他们的表述方式最终落实到五或六个关键词语上，当然也就是落实到"形式"的多种形态上。

施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研究"艺术就是方法"。

埃肯博姆："形式主义流派将文学当作一系列特定的现象来研究，并将文学史当作形式和文学传统的具体的和特定的演变来建立"（科尼欧版本，第 32 页）。同样，《文学理论》第 37 页中："科学的特定化和具体化原理是形式方法的组织原理。"关键词是：特定的、具体的、方法、原理，还要加上客观性、语言学。"形式主义者们"也将自己定名为形态学者（morphologistes）或

特性确定者（spécificateurs），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是研究构成文学的特性即其“文学性”（littéralité）和构成诗歌的特性即“诗歌性”（poéticité）。这种研究拒绝在<u>美</u>与<u>真实</u>之传统的和唯心主义的术语中进行，为的是观察可以将普通的言语活动转换为文学材料的方法。另外，“在我们的斗争中，重要的是，将在象征主义者们的理论著述中启发他们的主观审美原理与科学的和相对于事实是客观的一种态度的要求对立起来”（同上，第36页、38页）：“当传统的文学家习惯于将他们的研究引向文化或社会生活的历史的时候，形式主义者们又将其引向了语言学，这时的语言学在其研究之中表现为跨及诗歌的科学［……］。通过所有这些纲领性陈述，最为困难的观念即形式的观念，便采用了多种接受方式。最为固定的方式是，文学因形式工作而有区别，在散文方面，首先是一种构成性工作（参阅施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Sur la théorie de la prose］，［1925］，《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素材与风格》［Matériaux et style dans *Guerre et paix de Tolstï*，1928］）。在诗歌方面，首先是节律和音色的工作。

这一运动的功绩，并不是向后人提供有关相互确定的概念的一种方法或一个系统。如果我们置普洛普的发现于不顾，那么，形式主义甚至都不能提供任何新颖的概念即一种新的发现，这种发现有可能将彻底奠定言语活动运作的基础，而形式主义者们的力量，正像埃肯博姆所说的那样（科尼欧，书中到处，第25和28页），在于（在行动的格言之中）具有了某些原则，并从未接受哪怕是一点点的“折中主义”的影响。

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特征之中，应该指出总是采用一种具体的、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言语活动的范围之内，这一点表现为一种几乎是技术性的感知：这样一来，言语活动就像是能够完

成一些任务的一种工具，是“在每一种情况里都向着一种特殊目标努力的人类的活动”（埃利克著述中的引文，第60页）。既然语言是与一个目的相适合的一种手段系统，那么，就应该依据语言现象借助于各种话语所完成的功能来研究它们。本着这种观点，诗歌语言在其可以建立对于语言的比其通常的使用即散文体的使用更为有效的运用方式时，就构成一种优先的研究领域。此外（我们还都记得雅格布森几年之后通过他收入《语言学论集》中的《语言学与诗歌》一文在传播这些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诗歌功能并不限于诗歌。标语（和在各种类型的魔术或政治方面的应用）也借助于节奏和语音重复游戏在使用上述诗歌功能（雅格布森著名的例句：I like Ike[我喜欢艾克]）。

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散文，尤其是研究叙事的形态变化，对于“诗歌语言研究协会”（OPOIAZ）来说，就不是首要的研究对象。施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La théorie de la prose*）发表在1929年。他尤其表述了这样的想法，即习惯上被看作是属于内容的情节，实际上属于形式，恰恰是因为韵脚以及性格本身都应该被看作是隶属于情节，所以情节是“行动展开的简单的借口”。这些想法都在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可以找到，但却具有一种更为彻底的抽象和演示性的力量。

在莫斯科大学内部，功能主义又名形式主义的考虑并不是一切均顺利，因为这些考虑代表了年轻的一代对于以弗图纳托夫（Fortunatov）教授为首的新语法学派的造反。可是，这种功能主义的探索计划很快就在语言学家们那里表现了出来，它构成了索绪尔语言学强加给语言的系统性和共时性观点（或者说是科学观点）在俄语中的特定变化（具体的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的变化）。

在与布尔什维克官方之间的对立日趋严重的时候，形式主义流派的研究在雅格布森的促使下便部分地转移到了布拉格，雅格布森于 1920 年离开莫斯科，并于 1926 年创立了布拉格学派。俄国的其他语文学者和语言学家想必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当中，有卡塞夫斯克基（S. Karcevski）（他曾在日内瓦听过索绪尔的课）和特鲁别茨柯依（N. S. Troubetzkoï），后者并不属于形式主义运动，但他在其为俄国文学所开设的课程中尝试了形式主义的论题（埃利克，第 156 页，n. 10）。从这些共同进行的研究开始（在这些研究中，捷克大学的教授们与俄国研究者们之间的借鉴关系是共生共存的，远在雅格布森来到之前，布拉格已经有一个形式美学流派），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最初提出的概念框架应该得到扩大。

一方面（尤其是在恩斯特·卡西尔对于象征形式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影响之下），诗歌不再被看作"在其审美功能中的言语活动"，言语活动的审美理论今后就像是更为扩大的总体的一个分支，这个总体也包括非词语的言语活动，对此，我们已逐渐地获得了经验（施克洛夫斯基，1923，《文学与电影》[La littérature et le cinéma]），并且，这个总体从其他的发展中获得一种现代的意指科学：在布拉格学派的发言人穆卡洛夫斯基看来，审美今后应该可以用符号来描述，一种"符号学"（sém asiologie，该词后来被放弃，而让位于 sémiotique）有待建立。

另一方面，形式概念过分宽泛和多义，也让位于"结构"的指导观念，结构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它是富有生气地组织的，并且是可以感知的。这种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一部作品的特性，不取决于它们的组成成分之特性的简单累加，而是来自于结构本身——这就恰恰像是一种旋律，它通过它的转移继续等于它

自身),又被格式塔理论的坚持者们(埃棱菲尔[Ehrenfels]、克勒[W. Köhler]、卡夫卡和韦特海默)所重新创立,尽管它和格式塔以及形态变化[①]等术语已经出现在歌德的作品中。于是,“结构主义”就变成了布拉格派语言学家们的集合号,就像美学家们参加国际会议那样。在此,有一种与通过巴利、薛施蔼和布隆代尔介绍的源于索绪尔理论的一种表述方式:言语活动将不再看作是独立事实的集合物,而是看作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其所有的组成成分都相互作用。正像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见《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I,2,1945),布拉格学派就这样与在同一时代于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中都占优势的方向融会在一起了。

特鲁别茨柯依在《心理学杂志》特刊号上发表的《言语活动心理学》(Psychologie du langage)一文可以多少澄清这个结构概念在音位学上的地位。特鲁别茨柯依一开始就指出了(第227—228页、233页、241—243页)与索绪尔理论相比(他使用了一个多次出现的词“具体地”,第241—243页)构成布拉格学派科学进步的东西。布拉格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它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创立了第一个有效的语言学观念,即第一个真正可操作的概念,那就是“相关特征”(trait pertinent)[②](人们把在已知语言中为表述语义或语法的区别而使用的任何语音对立称为是“相关特征”:在可能的语音变化的总体中,唯

① 普洛普自己曾明确地说他是歌德的弟子。

② 特鲁别茨柯依在当时还谈到“音位对立”(opposition phonologique)。这就是他自己的定义:“一种音位对立是一种语音区别,它可以在一已知语言之中服务于区分智力的意指……任何一个音位对立的每一个项都是一个音位单位”(第232页)。

独相关特征具有系统指示的价值，唯独相关特征构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在语音对立之中，这种只考虑实际上被用来区分词语之意指的语音对立的想法，至少在1876年以后已由几位瑞士和德国的语言学家所提出（特鲁别茨柯依在其文章开头部分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从未在其逻辑后果中得到应用。雅格布森在研究《捷克诗歌，主要是与俄国诗歌相比较》（*Le vers tchèque, principalement comparé au vers russe*）（布拉格，1923）时，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想法。由于特鲁别茨柯依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重新研究和完善，这种想法已经达到了其可操作的形式。

这种"语言学观念"可以使人具体地谋求解决隔离和进一步看到语言的那些（纯粹任意的和关系的）无形构成成分的任务，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可以从人的言语活动的无数语音现象中选取按照索绪尔的意义属于语言的那些现象，即一已知语言的能指方面（表达之形式）得以构成的那些区别性的、对立性的和关系性的成分之网络；于是，人们便可以开始标记这些成分在一已知语言的内部和在世界所有的语言之中具体形成的系统。人们也可以开始找出所有语言的音位结构化的普遍规律。特鲁别茨柯依用了几页纸探讨了这一新的科学的广阔前景。下面是这位俄国学者开列的这门新的学科的几项优先考虑的任务清单：

——从整体上描述系统："音位学，由于在本质上是普遍性的，所以从系统出发，就像从它开始研究其结构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样"（第233页）。

——标记各种对立：析取和关联（第236页）。

——标记关联束：某些关联在其之间组合，其他则不。对于

这些现象的观察，可以建立一种更为详细的类型学，并依据这种组合所表现出的这些关联之间的亲和程度来为其建立等级。

——研究音位使用的规则，因为一个音位的内容可以根据它的位置来改变。

——统计各种音位对立的使用和论证它们相关的重要性，等。

理性地描述音位学的任务得到了很好的继续。但是，这种扼要的介绍至少应该能使人想像这些完善的、“果断的和鼓舞人心的”探索的意义，这些赞美、这些命令，已明显地列入了当时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工作日程——这是音位对立的基本和首要的观念的逻辑后果。在如此发现的相互作用方面的复杂关系，客观上对于每一种语言来说是可界定的和可描述的，这种关系界定和鉴别其特定的语音构架。这样，“结构”概念就几乎总是与系统观念相联系，它在其通常的功能中是富有动力的，并服从于演变。“结构”指的是系统的固定性和同一性，就像它在其各组转换之中所坚持的那样。因此，布拉格学派得以将音位学分离出来，作为具有科学特征的学科，得以第一次使索绪尔有关“区别系统”（这些系统使语言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的抽象观点具体化。

人们会看到，借助于音位学的根本发现而对于语言现象所进行的这种具体化，排除了任何对于心理学的求助。特鲁别茨柯依（《音位学原理》，[*Principes de phonologie*]，第 42 页和后面几页）明确地指出，“音位首先是一种功能概念，它应该参照其功能来确定”。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同时出现过对于具体的和客观的事实的意识、反心理学主义和功能主义，但是一切就好像布拉格的结构主义在很多方面代表着俄国形式主义的希望与诺

言的实现。

雅格布森（通常是诗歌方面的形式主义者，但在语言学和音位学方面是结构主义者）后来在全世界推广人文科学方面的这种新的科学性模式。于是，叶尔姆斯列夫 1928 年在海牙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听了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格布森宣读的论文之后，便建立了哥本哈根学派。他一下子就看到了音位学的发现可以带给语义学的东西（即便这同一位叶尔姆斯列夫很快就指出了“语义的音位学化”，与实际存在于作品内的逻辑关系在意指网络中的复杂性相比，这种音位化是非常笼统的）[①]。列维－斯特劳斯（《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1945）欢呼这些新的时代：“对于社会科学，音位学不会放弃发挥与原子物理学曾经对于全部准确科学（第 35 页）所发挥的作用同样的革新作用。”接着，他指出了布拉格学派的挑战，并将其发现用在了《亲代关系的基本结构》（*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parenté*）（1949）。从尚处襁褓之中的未来符号学的观点看，列维－斯特劳斯的著述也可以被看作是布拉格学派之发现的延续和在非词语交流领域中的应用。它就像是社会意指的一种“物理学”。

二、普洛普的 31 种功能

普洛普 1966 年发表了他对列维－斯特劳斯 1960 年针对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自其 1928 年一出版就在俄国获得了很好的评价）提出的批评所做的答复。在这篇答复文字

---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齐尔贝尔贝格在《意义的理性与诗性》中的阐述，第 19—39 页。

中，普洛普承认，其主要功绩（埃诺底版本第 207 页）在于他在为一系列都有一位后母作为共同主题的民间故事做比较的时候，观察到了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都同样存在的东西——尽管人物和场合都发生了变化：他非常惊讶，他发现，尽管被分析的故事总体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一定数量的行动却出现在所有的故事之中，此外，这些行动的接续总是依随着同一个图示。因此，行动的展现便是被寻找的固定成分。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十分明显，以至他对于在他之前无人意识到这些感到吃惊：如果人物完成的行动是同样的，并出现在同样的顺序之中，那么尽管细节有所改变，人们则必然与同一故事有关，难道不是这样吗？

于是，新的分析方法便集中在这些被称为“功能”（fonctions）的固定的行动方面。在普洛普的分析性语言之中（它有着成为一种元语言的趋势），“功能”一词不再具有其“服务于”的一般的和工具性的意义。在此，“功能”指根据其在叙事过程中的地位而被考虑的一种行动：同一个行动，例如接受钱的事实，根据这钱是对于已经完成的高尚事情的奖赏或是根据它应该用于获得可以实现一定作为的马匹，可以是各种功能的载体。“我们将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动，该行动是根据其在情节的展开之中的意指来确定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第 31 页）。

普洛普在其 1946 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传奇故事的历史根源》（*Les racines historiques du conte merveilleux*）的开头部分，对于他不仅在讲述一个可怜的孤儿遭受其后母虐待的民间故事中，而且在所有的传奇故事中，都发现的这种几乎不变的功能接续状况做过概述，这使他得以完成了形式主义者们的首要天职，并为传奇故事这一体裁赋予了特定性（第 16 页）：“这些故事都以在某个人身上引起的损失或错误（抢走，逃脱）或以获得某件东

西的欲望（沙皇派他的儿子去寻找火鸟）为开始，而后面的展开则为：主人公离家出发，遇到一个人，该人给了他一种魔具或一种魔术方法来帮助他找到寻找的对象。随后便出现：与对手的决斗（最为重要的形式是与龙进行战斗），返回和继续。这种组成通常变得更为复杂。当主人公接近家门的时候，他的几位兄弟则将其扔进深谷。但是，他最终返回了家里，他成功地完成了困难任务，而变成国王，并在他的王国里结婚，或者是与另一个王国里的公主结婚。"

这篇简短的介绍，只是部分地介绍了功能的单子，这个单子突出了普洛普对于选自作为斯拉夫语研究之经典的阿法纳西耶夫（Afanassiev）所辑故事汇编中的100个（从第50个到第151个）传奇故事材料所做的比较。列维－斯特劳斯的报告指出了面对"不可能进行细化的"功能名单所产生的某种灰心（《结构人类学》，II，第144页）。布雷蒙（C. Brémond）接受这一赌注，但是以我们下面看到的一种顺序为代价[①]，那是为在开头部分重提普洛普的研究结果而建立的顺序（黑色字体为普洛普的命名，无色字体为布雷蒙的审慎评论）：

远去：可能会缺少保护＋潜在的失败。

禁止：命令，是应对这种危险的一种保护性尝试，但也是一种潜在的不服从。

违反：不服从和对于这种保护尝试的抵制。

质问＋信息：失败的现实化。坏人获得了有关主人公

① 由于没有地方，我们将不重新提出整个单子，人们可以在布雷蒙的《叙事的逻辑》（*Logique du récit*）一书中看到完整的单子，第41—46页。

的重要情况。

欺骗+天真的合谋：失败的另一种现实化。坏人向一个任人左右的天真的人施展了阴谋。

坏事：由坏人完成的一项有害的行为。

调解：求救于他人或去救助，英雄进场。

相反行动的开始：主人公同意救助。

告别：传奇故事的高尚行为，总是流传很远。

[…………]

这个单子是有限的，这是其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基本的构成部分的重复超越人们所期待的一切”[……]，“功能的数目是很有限的：人们只能从中找出31种。我们材料中的所有故事的行动，毫无例外[……]，都是在这些功能的界限内展开”（《民间故事形态学》，第34页和第79页）。

但是，如果功能的数目是有限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主要人物的数目就应该更为有限。这些参与者（acteurs）是无法与构成其行动范围的所有功能分开的。于是，质问、信息、坏事或欺骗就属于反面主人公（“侵犯者”），相反行动的开始或告别总是主人公的行为。31种功能就这样分配在7种“行动范围”（sphères d'action）之间：侵犯者、提供魔力的人、助手、被寻找的人物、委托人、英雄和侵占者又名假英雄（同上，第96—97页）。在此，必须防备不能重新落入陈旧的思维习惯之中。人物被看作是行动的严格的发动机。他们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与他们的作为相连的。“刺探”或“窃取”涉及到“侵犯者”，“解救”或“归还”涉及到英雄，反之亦然。这完全像当语言说出：“风刮着”，风的观念在此被说了两次，因为刮着也是风专有的行动（即便

在精神上以这种一致的方式感受这种重复就像一个观念。这个例子也出现在比桑[E. Buyssens]的《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一文中(见《索绪尔手册》,18,1961,第25页)。普洛普没有建立两个单子:一个是功能单子,另一个是7个人物的单子,而是建立了一个单子,就在这同一个单子中,7个人物的出现就像是扩大了的单子即功能名单的组织原则。

因此,在我们谈论的数学观念的意义里,普洛普建立了一种符号学观念,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有关主要人物行动范围的自动性之发现所具有的影响。他经常满足于依据其功能的不变单子而使传奇故事的特定结构具体化,并因此满足于以林内的方式来发现分类的原则。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大胆的抽象化运动(他最终将人物的心理以与他们在社会或在其身体方面的其他细节中的位置一样的名义看作是一种场合性美化)会完全地改变对于行动和其连接情况的感知。在人物的联想和他们的所做(侵犯者损害别人,英雄救助人,就像风刮着那样)的这种自动特征之中,很快将看出自明之理之外的东西。

一方面,普洛普在使故事中的事件"失去现实性",他拆掉它们的链式连接,并显示出似乎是处理过的全部"组织"。不应该说:坏人窃取和欺骗,而好人将修复错误(这纯粹是句法上的关系),但是当然,在传奇故事中,总是有一个损害别人的坏人和一个与之对立的好人(范畴关系)。格雷玛斯后来指出,普洛普为行动的聚合式的再现打开了途径,或者说更为组合式连接的聚合化打开了可能(参阅本书第三部分)。

另一方面,直到当时,任何陈述都显示两个彻底对立的组成成分的关系,一侧是人们谈论的东西(依据使用的术语,主题[sujet]或论题[thème]),另一侧是人们就此说出的东西(有可

能是人们赋予他的行动和品质，或者是评注[rhème])。在普洛普的观察之中，人与行动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其中行动是首要的并且决定人。于是，一种有关行动性(actantialité)的理论就这样提前有所显示了，这种理论尤其在与布拉格学派接近的一位法国语言学家那里得到了发展，那就是吕西安·泰斯尼耶尔(Lucien Tesnière)。

不管怎样，在经普洛普分析之后，故事就不再是它在绝对奇幻的领域中似乎是的样子了；通过多次重复性的功能而确定的主要人物，就像是为规划好的一种适合任何时代的作为所安排的真正的代理人。(普洛普为在行动的可预见性之中来定名它们而选定了“功能”这一术语，这是否就是对于这一术语的一种验证呢?)。这样发起的抽象运动为形象性幻觉提供了一个术语，并迫使人至少感觉到两个意义层次：

——情景和性格创意层，这些创意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在故事中，一切都可以发生)，通过这些创意，故事在显示、在个体化并取悦公众(这一维度在后面很快将被定名为话语语义)；

——叙述限制层(它很快将被称为叙述句法)。

普洛普比那些“正式的”形式主义者们的研究高出一筹，他排除了任何审美考虑，并在至此叙述的自动性尚未开垦的空间中寻求方法，而不是像施克洛夫斯基本身或像埃肯博姆在他们的分析当中那样去继续为自己提出有关情节、风格和布局谋篇等同样陈旧的问题。就像音位学家或者是像索绪尔那样，普洛普不关心任意的方法，而是集中在逃避说话主体的意识规律

(《历史根源》, *Racines historiques*, 第 36 页)。也像特鲁别茨柯依得以找出表达之形式的固定特征那样,普洛普最终通过实践一种共时的、系统的和普遍的研究而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内容之形式的一些固定特征。

第三部分

从符号－语言学到符号学：巴黎符号学派

60年代初，虽然说格雷玛斯在意指研究方面是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的真正继承者，但是，他是通过一种个人的非常不典型的历程才接触到了言语活动理论的。大约在1933年，这位16岁的立陶宛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决定学习法语，他此前为了能阅读尼采的著述而自学过德语。当他决心学习法律的时候，他连一个法语单词都不懂。格雷玛斯潜心于符号学的探索，至少从表面上讲，是源自30年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一些历史偶然性。第一种偶然性，是在立陶宛政府为对付希特勒而在政治上有所改变之后，1936年，他获得了赴法国格勒诺布尔市学习法语的奖学金。第二种历史"偶然性"，是1944年苏联人驱逐其父母，这就迫使这位后来成为地理教师的年轻人不得不移居国外。

1945年，他一到达巴黎，就师从布吕诺(Ch. Bruneau)，开始撰写词汇学论文，在他看来，那是一篇"牵强的论文"，认为不值得出版。在进行这项工作期间，他大概还与另外两位词汇学家有过来往，他们是马托雷(G. Matoré)和凯玛达(B. Quémada)。当时，这一学科需要重新建立；于是，他们开始阅读索绪尔和特里埃(J. Trier)的著述(他们先于其他所有语言学家)。在他进行了他的博士论文《1830年的时装。论当时时装杂志的服饰词汇描述》(*La mode en 1830. Essai de description du vocabulaire vestimentaire d' après les journaux de mode de l' époque*)的答辩(1949)之后，他立即去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因为有人建议他担当那里大学的一个讲师的职务，负责讲授法语史。

格雷玛斯到达亚历山大一个月之后，罗兰·巴特和森热文(Ch. Singevin)也从布加勒斯特来到了亚历山大。这一小组人便形成了以阅读和讨论认识论为内容的一个友好团体的核心，

该团体持续了七年，尽管罗兰·巴特在一年后就返回了巴黎：他们的讨论每年夏天在法国维尔弗朗什(Villefranche)租用的一个别墅里进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他们发现了雅格布森、叶尔姆斯列夫、列维-斯特劳斯、莫斯、拉康，或着还有梅洛-蓬蒂(等等)，同时他们花大价钱从法国和美国购置最新出版的书籍。

随后，他又在安卡拉结识了其他知识界朋友，并发现了赖兴巴赫(Reichenbach)的逻辑学。1960年夏天，在贝藏松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格雷玛斯认识了两位重要的语言学家，他们是哈利戴(M. A. K. Halliday)和赫格(K. Heger)。于是，他决定加盟迪布瓦(J. Dubois)、谢瓦利埃(J. -C. Chevalier)和密特朗(H. Mitterand)的研究工作，这些语言学家试图通过建立法语研究协会(SELF)来纯净法语语言学，当时加入这个协会的还有两位语言学界的"泰斗"，他们是瓦涅(R. L. Wagner)和古根海姆(G. Gougenheim)。他在安卡拉大学担任教授，一直到1962年，正是在这一年他担任了普瓦捷大学的教授，从此便正式进入了法国大学教授的体系之中。第二年，他在继续于普瓦捷大学执教的同时①，还给巴黎普安卡雷学院②讲授结构语义学课程，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一表述方式，两年之后他以同一名称出版了他的书。由于量化语言学中心(Centre de Linguistique quantitative)紧张的

① 当时，在普瓦捷大学，为数很少的大学生对符号学感兴趣。只有一个学生坚持听符号学课，他就是弗朗苏瓦·拉斯捷(François Rastier)。

② 量化语言学中心(Centre de linguisitique quantitative)，在那里，报告人和听众都是在法国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新一代的年轻土耳其人后裔：在格雷玛斯之外，有坡蒂埃、迪布瓦、格罗斯(Gross)、鲁威、格吕尼格(B. N. Grunig)，等。

活动,便产生了创办一种杂志的想法,于是有了由罗兰·巴特、坡蒂埃(B. Pottier)、迪布瓦、凯玛达、鲁威(N. Ruwet)创办的《言语活动》(*Langages*)这个杂志,而这个名称则是格雷玛斯依据《精神》(*Esprit*)或《现代》(*Temps modernes*)的叫法想像出来的。这个杂志一下子超出了严格的语言学范畴,而从它一出现就包括了整个符号学领域。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了有关迪梅齐(Dumézil)的一篇无人想写的非常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文章(《比较神话学》,*La mythologie comparée*),随后,他产生了把文章直接寄给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列维－斯特劳斯回复了他,六个月之后,格雷玛斯被任命为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的主任(1965)[①]。在这个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研究的避风港内,他终于可以全心地投入到——就像他所同意的那样——对于言语活动的研究之中了。在后来的岁月中,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主持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研讨会,这是一个极为忙碌的实验室,有关理论的各种变化均在此得到论证。

---

① 见《新文学历史》(*New Literary History*),XX,3,第542页。

第一章 《结构语义学》，第一次综合性研究（1966）

作为“奠定了后来成为符号学之基础的著作”（J. –C. 科凯评语，1985），按照 G · 迪梅齐的说法，它是一部芜杂、大胆和“骇人听闻的”著述。在格雷玛斯于 1958 年将叶尔姆斯列夫的《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一书的英文版本搞到亚历山大[①]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结构语义学》的第一稿。阅读《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一书所带来的冲击波，使他立即毁掉了自己大约二百页纸的手稿。

> “书中无一个多余的词语，文字严肃、简洁，概念明确……因为所有的概念都是相互确定的，它们的并置可以产生一种古怪效果……由于在阅读时一切都是明确的，而最后这种过分明确又使您难以把握，所以这就迫使您要把一个句子读上三遍……这使我想到那些玻璃房子[……]，而这一切，便以这种方法经济学方式，构成了一种书写科

---

① 关于格雷玛斯的“一生传记”，可以参阅让 – 克洛德 · 科凯所著《符号学的紧迫性与前景》（*Exigenc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émiotique*），Benjamins 出版社，1985。

学。"[①]实际上，《结构语义学》参照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隆达尔（Bröndal）之处非常之多；由于《言语活动理论导论》一书揭示的内容所带来的智力上的"疯癫"，对索绪尔著述的阅读就变成第二位的了；《言语活动理论导论》所揭示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新的成就（我们还记得1956年发表的《索绪尔主义的现实情况》（*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一书中的提法），而其展开的各种关键思想（特别是其内容之形式和"客观"分析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思想都区别于内容平面）都因一种极为具体的研究工作（尽管还是表面的）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

《结构语义学》首要的成就，在于它提供了义子分析例证[②]，这种分析为两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方面为革新文学研究（可以使细微区别具体化，或使多义性[③]明晰化），另一方面为进行词汇学的综合探讨（从这时开始，已经能够考虑将其用于词汇学史的研究、语言教学或者是广告文本的首批分析之中）。

但是，这些成就，由于最后变成了趣闻性的，所以有时几乎让人不了解这部极为重要的著述的真正影响力。在这部著述

---

①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未曾发表）。

② 借助于注意文本中或潜在的或非潜在的对立关系，来突出语义的区别性特征。

③ 多义性（polysémie）一词，源自布雷亚尔（Bréal）（索绪尔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读书时的老师），用来指语义关系的极不稳定性，也指每个词在相同的语境中和在同一时刻能够具有可能是矛盾的广泛的意义的现象。

中，那些属于格雷玛斯自己的符号学关键思想处于尝试自己运气的状态。说真的，整个公理基础和格雷玛斯在其作为研究者的生涯中所应该探讨的总体设想，在这部包容了认识论、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著述中，都有其明显的位置。既然这种总体在其他地方[①]以系统的方式得到了介绍，我们在此将仅限于概述一下这部书的主要方面，同时我们很清楚，这里对格雷玛斯的研究工作进行的浓缩，只是对于那些决心以各种方法来对这部著述进行广泛了解的人们才是可以理解的。

在实践方面，“一种描述样本”为贝尔纳诺斯[②]的全部想像世界揭示了《莫泊桑，文本符号学》（*Maupassant, Sémiotique du texte*，1976）一书对于一个短篇小说《两个朋友》（Deux amis）所出色地进行的分析内容：那是对于由理论所建立的一些新概念（特别是同位素概念、意指的基本结构概念、义素概念和义子组合概念）的启发价值[③]的一种演示。

在理论方面，我们刚刚列举的那些概念被认为是可操作的（应该将其与通常的概念加以区别，通常的概念一般都属于假设范畴），并且因为它们相互确定而具有完全联系的性质：它们相互确定，并在最后时刻建立在数量有限的一些明确提出的公理基础之上。对于格雷玛斯来说，“理论”概念具有杰出的描述价值，其特点在于适合于进行具体的分析，且与认识论基础有着严格的一致性。因此，在格雷玛斯的领域，理论并不与实践对立，真正的理论是只有通过实践才具有价值的一种公理方法论，

---

① 安娜·埃诺著《符号学》（*La sémiotique*），“我知道什么”丛书。（我们前面说过，这本书实际上并未出版。——译注）

② 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天主教作家。——译注

③ 即由其所带来的可理解性效果。

而理论的认识论水平则是由方法在智能上所建立的东西。

在认识论方面，《结构语义学》进行了得到法语研究协会①支持的一个项目的研究，该项目旨在将对于仍属于真正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表面的句子与句间结构②的探讨转移到对于在更深层次上承担话语一致性的跨句结构的探讨。格雷玛斯通过把《民间故事形态学》进行"压缩与结构化"——他这样做是为了"延续普洛普的形式化努力"（格雷玛斯，1965），而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智力手段，因为该问题到这时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他先是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无法躲避的口号用在了普洛普的结论上，这使他很快就进入了死胡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导致普洛普进行的叙述连接研究即制约语序出现的研究（句法关系分析）归于失败的现实主义幻觉。但格雷玛斯却以下面的方式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如果想成就一项科学工作，与此相反，那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可以使文本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起来的更为抽象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是建立在严格地对立的区别性特征的形成与扩张过程基础上的。这项研究工作最后导致建立了一些（聚合项的）要素类别，这些类别在同一个类别内部是相像的，但与对立类别的要素相比则以相同的方式相区别。因此，为普洛普的《民间

① 法语研究协会（SELF）：是由一组研究者于1960年创立的，其中特别有迪布瓦（J. Dubois）、谢瓦利埃（J. －C. Chevalier）、罗兰·巴特（R. Barthes）、格雷玛斯、古根海姆（Gougenheim）和瓦涅（Wagner）。我们这里指的是1966年11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格雷玛斯通报的内容。

② 句子结构，指的是对于句子和句子图示的构成要素的分析。句间结构，指的是对于句子之间的语言学标志的研究。跨句结构，指的是建立在对于话语是由脱离句子形式范畴的各种逻辑—语义规则所支配的辨认基础上的研究。

故事形态学》建立聚合关系，使他看到，民间故事始终是把一些对立关系如命令－指令对立于禁止－禁令、服从对立于不服从联结起来的。这种语义世界的特点在于在两组对立关系中创立特定的关系。

对于格雷玛斯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这种研究方式又回过头来在首先/然后[①]这类（句法上的）限制关系方面茫然不知所措：首先（禁止）——然后（违反）或是首先（对峙）——然后（胜利），因为这些限制按照似乎就是叙述性本身之特征的一种逻辑从多方面确定所观察到的各种对立关系。

格雷玛斯在进行了多次的分析之后[②]，终于确立了一种宏观单位——考验（épreuve），该单位进入由三种考验组成的一种聚合关系类别之中，并且以两种方式表明了其句法上的多种决定因素。从外部方式上讲，三种考验——品质考验（qualifiante）、主要考验（principale）和荣誉考验（glorifiante）——的顺序和时间先后是不会改变的，而在内部方式上，三种考验中每一种的构成（对于三种考验都是一样的，并由此组成它们的类别）本身也是受严格的句法顺序来支配的：首先是指令即规定一项任务，然后是反应即主人公的接受；接着，首先是对立即斗争，然后是胜利即成功；最后，是结果。这样一来，格雷玛斯就找到了可以解决聚合与句法这两种步骤之间出现的二难推理（在当时，

① 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之前于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比较神话学》（*La mythologie comparée*），后收入《论意义》（1970）之中，该文在这一点上是更为明确的。参阅《论意义》，第130页。

② 参阅上述《符号学》一书，第一部分。

大概被过分地看重了)的方法了[①]。他当时使用了由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的行动的聚合表现,同时指出,人们实际上应该使句法关系本身聚合化。由此,大量借用的公理(doxas)和概念甚至是发明的概念堆积在了《结构语义学》之中,由此,多种途径就这样得到了发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定位格雷玛斯最初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赋予了这部著述以新颖性和在其全部著述中占有的突出地位。

① 只关心评价在这种区分之背后所采用的方法问题的非语言学家,也许由于他们认为这种区分过分精细,而只愿意查阅迪克罗(Ducrot)与托多罗夫(Todorov)所著《语言科学百科全书词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Science linguistique*),第139—146页。

第二章　内容的转移行程或第二次综合（1966—1979）

《结构语义学》并列了两组表面上看是异向的理论。一方面，所有涉及到意指基本结构的内容（第 18—171 页），都像布拉格语音学派那样，关心各种范畴的对立。另一方面，关于行动模式和转换模式的思考（第 172—221 页）源自对于普洛普研究结果的一种压缩和结构化，这些思考一方面建立了一种包括六个行动者[①]的单子（主体—对象，发送者—接收者，助手—对手），另一方面建立了在叙事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行动的一种展现图示。正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因为这种模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这种图示包括：

---

① 行动者（actants）是一些"语法"角色，由于它们严格地由行动确定，所以可以使叙事文表现发生的事情。它们的数量有限，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发生某种事情的所有叙事文中，是当时令人惊奇的发现。一篇叙事文的人物（即扮演者）"体现"行动者，同时为其补充一些形象化的决定因素。与布雷亚尔的直觉（《语义论》，*Essai de sémantique*，1897）相比，其重要的进步在于，人们已经能够组成数量有限的行动关系目录，这些关系赋予了叙述活动表现行动的可能性。行动者目录中掌握的这些关系，是拿取（prendre）（主体—对象）、给予（donner）（发送者—接收者）、主导（dominer）（主体—对手）。当布雷亚尔偶尔列举他的例证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是在说明上面的规则。

1、主体的品质行程，即品质考验，在这种考验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位主人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获得了宝剑和神马，这两样东西使他可以进行主要的考验；

2、决定性的行动，即主要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中，主人公完成其使命；

3、荣誉考验，在这种考验中主人公获得一种赞赏。

这种几乎是数学的逻辑与人类学的语法是对立的：这种明显的不一致，与话语可接受的一种理论是不相应的。自《结构语义学》出版和人们试图运用书中的某些分析工具之日起，格雷玛斯就把精力用在了这一新的认识论问题上了。于是，1966—1979 这一阶段，人们在认识论方面进行了频繁的再评价工作，旨在指出，布拉格音位学派和哥本哈根语符学派所阐述过的二元逻辑对立，在意指生产的复杂行程之中，是怎样与叙述语法的人类学模式联结在一起的。

同是在这个时期，叙述语法越过了对于形象性叙事文（民间故事，小说，神话）的分析，进入了研究无人物并表现出一种抽象性的所有话语阶段：司法话语（E·朗多夫斯基：《司法话语的符号学分析——关于社会与社会集团的商业法律》，[E. Landowski, *Analyse sémiotique d' un discours juridique——la loi commerciale sur les sociétés et les groupes de sociétés*]，1971），以《建立拓扑学符号学》（*Pour une sémiotique topologique*）一书为标志的城市规划的空间话语（在这本书中，城市文本被赋予了叙述性）（1972），分析烹饪法程序的烹饪话语（《罗勒大蒜粉条菜汤或一种价值对象的建构》[*La soupe au pistou ou la construction*

d' un objet de valeur],1979)[①]。

最后,便是格雷玛斯使符号学所关心的方方面面出现重大多样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继续进行其对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或是对于建立一种文化符号学的可能性条件的思考(通过收集在《论意义》[*Du sens*,1970]和《符号学与社会科学》[*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1976]而得到了具体化),另一方面,在其周围引起了众多的研究:宗教话语(卡迪尔小组,而尤其是昂特维尔纳小组[②]),视觉话语(弗洛克[J.-M. Floch]),音乐话语(塔拉斯蒂[E. Tarasti]),建筑学(雷尼耶[A. Rénier]),心理治疗(达罗[Y. Darrault])。为了加快研究成果的流通,1977 年创刊了《符号语言研究团体通报》(*Bulletin du Groupe sémiolinguistique*)(安娜·埃诺);在出版《资料》(*Documents*)的事宜交由埃里克·朗多夫斯基(Eric Landowski)(1979)负责之后,这份通报成了两种《符号学学报》(*Actes sémiotiques*)中的一种。

在这一时期,格雷玛斯的重要文本,采取了文章的形式[③],

① 在《结构语义学》中被定名为助手与对手的两个行动者,今天已经消失了,今后,四种主要的位置取代了普洛普的固定人物:它们是**主体—对象**,**发送者—接收者**,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以新的义子范畴的四项来展开。例如,叙事文几乎总是包含着**主体**的对立面,即其反主体,反主体是对手的更为形式化的书写方式。

② 卡迪尔(CADIR)小组(包括热尼[F. Genuyt]、卡路[J. Calloud]、帕尼[L. Panier]、德洛姆[J. Delorme])是指里昂宗教话语分析中心(Centre d' Analyse du Discours religieux de Lyon),该小组尤其出版《符号学与圣经》杂志(*Sémiotique et Bible*)。昂特维尔纳(Entrevernes)小组的某些成员也是卡迪尔小组的活跃分子,出版了多部分析圣经的重要著述,其中包括《符号与寓意》(*Signes et Paraboles*),格雷玛斯为其写了后记(1979)。

③ 这里说的不包括《莫泊桑、文本符号学》(1976),那是一本书,书后附有对于很短的《两位朋友》的分析实践。

每一篇有三十页左右,这些文章阐明了叙述语法的特殊方面,或是阐述了整体理论。下面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一些文章:

《叙述限制的游戏》(Les jeux des contraintes narratives)(与 F. 拉斯捷合作,1968),相对于深层逻辑结构而言,文中首次描绘了对于叙述结构的展望,以及义子范畴依据符号学矩阵所产生的转换。

《自然世界符号学的条件》(Conditions d'une sémiotique du monde naturel)(1968),是有关"自然世界"以被感知所分割和所连接的一种符号学的形式进入一种复杂机制中的方式的泛符号学思考,在这种复杂机制中,"有关自然符号学表达平面的所有范畴,都对应于词语符号学的内平面的所有范畴"(《语言活动》杂志,10,第 13 页)。

《叙述语法要素》(Eléments d'une grammaire narrative)(1969),该文深入研究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叙述语法的构成要素(未去研究那些主要的考验所构成的大的单位,而是研究叙述性陈述以及它们的组合情况,也就是说,非常严格地研究了主体与对象的相关行程)。

《一个叙述符号学问题:价值对象》(Un problème de sémiotique narrative:les objets de valeur)(1973):这篇文章比前几篇更为具体和更具应用性,与另一篇同年发表的重要文章《行动者,参与者和外在形象》(Les actants,acteurs et figures)一起成了许多符号学初学者们的首选入门途径。前者提供了有关价值传播各种形式的一种类型学,这种类型学是建立在对于有权具有这些财富的各种主体进行严密考察基础上的;于是,他便根据传播行为在让与者同意的情

况下发生或不发生以及这种同意的性质，来观察传播行为的变化：例如，虽然英国女王同意向印度的副国王转交最高的权力，但她仍然还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涉及到一种参与性传播，因为它不会导致让与者的失去，这与放弃相反。

《行动者，参与者和外在形象》，在作为起主导力量的行动者的更为抽象和更为深在的平面与作为参与者平面的更为广阔的语义投入平面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参与者因其各种外在形象的规定性而具有个性。这篇文章标志着模态研究的开始，这种研究后来成为1975年一次研讨会的内容。模态是动词态势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把另一个动词作为自己的对象，例如想要(vouloir)做(两种动词形式必须具有相同的主体，这并不是看见(voir)做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种模态结构)。

在决定性行为，即改变一叙事文的境况和标志其部分实现或全部实现的行为，也被表现为是一种模态结构(行为是使存在的东西)的时候，有关模态的思考是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的机会。这样一来，叙述语法就完全地表现为一种模态语法了。

《建立一种模态理论》(Pour une théorie des modalités)(1976)尤其对模态结构的组合情况感兴趣，这些模态结构可以允许在句法关系方面依据主体相对于无外在形象的社会发送者(法律、规则、协议)和有外在形象的发送者(阿尔蒂尔国王、圣女贞德的声音、马拉美的天空、各种经书中的上帝)而表现出的想要、应该和其懂得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评定主体。

模态问题的形成,在这一问题可以将做的程序(*programmes de faire*)或存在的程序(*programmes d' être*)(此前,这些程序已经可以将作为规则图示的考验的大单位进行分节和分解)切分成行动行程(*parcours actanciels*)的时候,它成为了符号学历史中划时代的事件。另一方面,它使叙述性阅读扩展到词语文本、造型文本或举止文本成为可能,而在开始时人们则无法想像它们“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在一个拒绝说话的患精神病的孩子的举止中,也可以在有关这种情况的化学与生物学试验的报告中,观察到一些潜在的模态指示(想要和应该)或现实的模态指示(能够和懂得)。回过头来看,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总结出的那三种考验(品质考验、主要考验、荣誉考验)的规则图示,从此则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图示,被视为是借助于言语活动来记忆生活的意义,来记忆对于在一个团体或一位个人的生活中产生意义的那些行动链的某种总体认识。这种图示所具有的普遍性,小于总结为操作(Manipulation)、行动(Actions)(其本身也被分节为获得能力和技能)和确认(Sanction)的新图示,而这种新图示被认为可以用于与状态改变的表现形式有关的(形象性的或非形象性的)所有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结构语义学》一书,是怎样一方面被看作是关于义子范畴的书籍——因为义子范畴是正与负这种简单的对立结构(第 18—29 页),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关于复杂的对立结构的书籍——因为这种复杂的对立结构似乎取决于对于普洛普式叙事文的聚合性阅读(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进行的那样),并且可以按程度汇聚和写出指令对立于接受和禁止对立于违反这四种功能:

$$\frac{a}{\text{非}\,a}=\frac{\text{指令}}{\text{接受}}=A=\text{建立契约}\quad VS\quad \frac{\bar{a}}{\text{非}\,\bar{a}}=\frac{\text{禁止}}{\text{违反}}=\bar{A}=\text{契约破裂}$$

1965年的文本在这里谈的是"一种基础义子结构的表现"。《结构语义学》更慎重地谈到了"义子系统"(第195页)。不管怎样,我们在此观察到了趋于对这个时期进行重要综合的一种思考的起点。

这里举出的四个术语,在纵向和横向上相互对立:指令,即给予一个命令,是与禁止相反的;接受一个命令是与违反相反的。但是,指令也对立于接受,一如指挥对立于服从或制定禁令对立于不服从。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这里,义子范畴也叙述作品,因此也不能不看到,由普洛普区别出的那些功能便与基本的义子范畴一起属于相同的逻辑基础。只是,叙述所带来的复杂性可以使人觉察到:1、一个术语可以同时产生完全不同的对立(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二分法提供的是否定类型的交替选择或对立,例如有声对立于非有声,或者是质量类型的对立,例如尖音对立于钝音:因此,音位成对不能表现出语义成对那样的复杂性,这样的二分法对于语义成对就不够了);2、为了真正地进行阐述,必须看到a与非a必然是第一个行动者成对即解决问题的两个行动者(发送者,行为主体),而禁止与违反之对立更可以说是制造问题的行动者(状态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述比例式便可以建立更多的联结关系。这种不等性明确地显示出,在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故事简约为A对立于$\bar{A}$这种对立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对立具有相同的内容,并且是同位素的,那么,由四个术语组成的比例式所掌握的意义效果,就会像是同一意义空间的更为复杂的一种转移(这种转移更富有补充性联结作

用）。

人们在我们引用的文章里还可以看到格雷玛斯（与布朗谢进行的有关知识结构的研究工作同时[①]）为提出符号学矩阵[②]所走过的道路，符号学矩阵是一种对立关系、互补关系和连带关系的机制，它可以根据任何一种义子定位来出现。在任何特定的意义领域之外被人理解而且表面上看是普遍有效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也许是第一次具体地提出和使人看到了一种真正的结构。

第一批符号学矩阵（1968），首先被用来从空间上形象地表现同一范畴中的四个不同的极（例如允许，禁止，非允许，非禁止）的各自情况，在这个矩阵中，可以看出由叙事文的不同阶段所引起的连续的各种状态。但是，从 1971 年起[③]，格雷玛斯还观察到，这种图示方式不仅可以记录各种对立关系，而且也可以记录产生这些对立关系的过程。从此，符号学矩阵便可以表现一种发展过程，以及表现作为转换行为执行者的主体的行程：因此，符号学矩阵可以很好地阐述更为表面的叙述图示。

---

① 见布朗谢（R. Blanché）所著《知识结构——论概念的系统组织》（*Structures intellectuelles. Essai sur l'organisation systématique des concepts*），巴黎，Vrin 出版社，1966。布朗谢的计划是“阐明和研究一种基本的结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地由一些完全是基础性的过程来操作，而没有这些过程，甚至连最为卑贱的思想都不能得以进行”。

② 这一外在形象在《符号学》一书得到了介绍和讨论。

③ 见《一法律话语的符号学分析》（*Analyse sémiotique d'un discours juridique*），第七号“工作文件”，于尔比诺（Urbino）与朗多夫斯基（E. Landowski），还可以参阅在这个问题上与内夫（F. Nef）的谈话，见《意指的基本结构》（*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signification*），Complexe－PUF 联合出版，1976。

这种应用与简约活动，先是由列维－斯特劳斯继而是由格雷玛斯进行着，最终导致实现了布拉格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曾经达到过的聚合关系的逻辑性范畴化与普洛普的语法性句法范畴化①的一种新的综合。此外，把对于依据一种连续的过程从最深层（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到最表层（也是最复杂的层次）互相叠加的同位素层组成的意指的构成行程进行这种表现，具有话语的普遍理论价值。在每一个假设的层面之后，都有一些新的总体的形式形成过程，并且，符号学的宗旨准确地讲就是阐述这些不同的规则性：在深层上，我们早已认出了构成模式（符号学矩阵）的相关性，在中间层即叙述层上，叙述性的极富特征的结构主导着陈述②的全部构成，在话语的表层上，即参与者和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外在形象层上，我们可以设想新的规则性，这些规则性现在还是模糊不清的，但它们从此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优先的研究。

由于具有了一种话语理论——这种理论是在与索绪尔的论述相协调的情况下对于其行为的思考，符号学便确保了其操作概念的连贯性，这就使其相对于那些尚未在认识论方面得以确定的语言学来讲，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超前性。

另一方面，符号学可以将其对于行动的程序活动的描述看作是一种获得，因为它已经懂得在叙述的表面上是连续的波动之中创造说得过去的间断活动：每个叙述程子，即每个叙述性陈

---

① 导致这种新的思考活动，是与产生第一次综合的思考活动相似的。只是，概念领域从形象性叙事文专有的连贯性扩大到了话语的总体连贯性。

② “意指并不首先通过陈述的产生和其组成话语来获得；它在其行程过程中借助于各种叙述结构来替代，而且正是这些结构产生被认为是分节联结成陈述的话语”，《论意义》，第159页。

述,都构成一种有别的而且得到很好界定的单位。近二十年来,这种研究的所有成果都确切地载入了一部旨在建立一定权威的工具书之中了,即格雷玛斯与库尔泰(J. Courtès)联合编撰的《符号学词典》。[①]

① 全名为《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推理性词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译注

第三章　走向第三次综合(1980—1991)

《符号学词典》的出版(1979)既激起了研究者们的满足(他们终于看到他们需要使用的所有概念都得到了确定和最终的定名),也激起了他们的不满足——因为在严格地承袭已经包含在《结构语义学》中的所有命题的情况下确定下来的理论的经典形式,已经不再适合于符号学研究的真实进展状况了。齐尔贝尔贝格(C. Zilberberg)长时间以来传播他有关张力性和视差(phorie)的研究工作,科凯(J. – C. Coquet)早已建立了他的主体符号学,托姆(R. Thom)和珀蒂托(J. Petitot)指出了那些含蓄形式的图示化途径,而且他们两人都对构成模式[1]持批评态度。在格雷玛斯方面,他也早已开启了对于这一整套理论的批评,在他看来,这一套理论的主要不足是不能掌握真实的变化[2]——这种变化无法让人确定其各个时刻即那些明确的点,因为改变完全是逐渐的。重大的根本性变动最初是悄悄地进行的,经常

---

① 尤其参阅《简报》第17期,1981年,《符号学矩阵》。

② 关于这一论题,请参阅珀蒂埃(B. Pottier)的文章《符号学的一个不被喜欢的对象:变化》,收入《符号学的要求与展望》(*Exigenc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émiotique*),第499—502页。

出现这样的情况：借助于在《简报》[①]上发表《建立一种激情符号学》一文，提出关于这一论题（1978—1979）的第一次研讨会的理论基础。

支持对于同一科学计划进行第三次的讨论，也许并不是荒诞的，这一计划在于试图压缩存在于对于事件的重新确立（这也是借助于一种非连续的理论比如叙述性的理论对于改变之动力的重新确立）与对于实际意义的感知性理解（这种意义在语言本身产生一些流动的和连续的现象）之间的距离。作为时代性的一种标志：1983 年发表的《懂得与相信：是一个认知世界》（Le savoir et le croire：un seul univers cognitif）一文第一次介绍了对于符号学矩阵的一种等级式的表述：认识论行为——肯定（affirmer）、拒绝（refuser）、接受（admettre）、怀疑（douter）——不是通过矛盾、不是通过明确而有区别的阶段来进行的，它通过多和少来掌握变化的时刻。因此，它不再是一种断续的外在形象，对于这些外在形象，不论是索绪尔，还是叶尔姆斯列夫，或是特鲁别茨柯依，他们都希望能够以此来阐述明确的和有区别的认识对象。在我们看来，有关一个人、一个事物、一个场所或一个时刻具有价值的方式的思考，将延长对于理论革新的这种探讨[②]。

高等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近几年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真（Vrai）、善（Bien）和美（Beau）这几个方面了。这些重大的主题

---

① 《符号—语言学小组简报》，6，1978。

② 《符号学词典》（第二部）（1986）是根据同一思想编撰的，被几位有经验的弟子解释成为一种古怪的狂欢。然而，一切都证实，格雷玛斯本人一直认真地看待由他的学生们又被称为巴黎符号学派编撰的这部著作所包括的路径和研究的问题。

显然都还没有从哲学角度得到阐述：人们只是曾经尽力观察这种“纸上的主题”，选择其价值，而更一般地说，是选择这些价值在话语里运行的方式。

三次以公理学为对象的研讨会的成果之一，是指出经典的古代时期的三种价值化系统是怎样具有不同的体态（aspectuel）品质的。于是，对于古典道德观（义务的道德观，欲望的道德观，或是集中于善的方面的快乐的道德观）的研究，导致特别重视过多（excès）与不足（insuffisance）的体态范畴（美洲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节日以过多为积极标志对立于英格兰人看重不足的间接肯定式道德观），同时也特别重视适中（modéré）（印欧人讲求无任何多余）。研究美的那一年的研讨会证实，审美与完成体态（完成式）或未完成体态（渐弱式、始动式，等）有关系。

此外，体态不大容易以二分法的范畴术语来理解。它们属于等级的评价，就像布隆达尔著名的六边体试图建立的评价。或者，更因为它们是很难确定其位置的，并且又总是移动的，表面上，它们躲避以散在单位形式出现的间断性活动，就像在多与少的顺序当中它们总是这一些依靠那一些一样。

这一研究时期，对于自索绪尔以来的符号学的所有成就都提出了问题，有可能导致对于旨在回答由叶尔姆斯列夫的潜在格式塔心理学所留下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重新的整理：分析的连续性是什么？

格雷玛斯近些年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以体态术语（而不是以模态术语）来重新解释与情感氛围有关的东西（情绪学），致力于在话语层的体态化过程一侧（使参与者的空间、时间和举止存在的各种方式）大体勾勒出与各种价值化过程有关的深层体态性。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构成了这些努力的依据:最终能够建立一种有关激情的符号学吗？最终能够像叙述图示中的那些考验一样,大体上建立起新的重要单位而这些单位又可以成为进行不断的形式发现的起点吗？我们能否找到一种理论基础来着手建构弗洛伊德愿意称之的这种元心理学(Métapsychologie)吗?

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格雷玛斯的著述就在这些问号处停笔了。它们是巴黎符号学派未来时间的研究规划。

结　论

1、您是否期待着这本《符号学简史》要从亚里士多德、阿兰·德·罗勒[①]、托马斯·德·阿奎那[②]或是13、14世纪的语式论者们开始呢？是否也需要为加利安医生[③]安排应有的位置呢？符号学的哲学是要举出这些古代和中世纪的医生、语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并将其视为是先驱者：任何曾经构成理性的解释工作的东西，均因此而被提及（例如可以参阅迪利[J. Deely]在《符号学导论》[*Introducing semiotic*]中提出的符号学史，布卢明顿，1982）。

对于在此按照历史顺序介绍的符号学理论，不适宜对于各方面的先驱者都去进行考察。刚刚过去的世纪曾经历过对于符号学观念的发现和建立，对于这些观念，不曾有过前人。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以其最大的努力宣布了符号学理论。他们提前

---

① 阿兰·德·罗勒（Alain de Lille, 1115 或 1128—1203）：意大利神学家。——译注

② 托马斯·德·阿奎那（Thomas d' Aquin, 1227—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③ 加利安（131—201）：古希腊医生，他在解剖和治疗方面都很强，他有关"情绪"的理论一直影响到17世纪。——译注

指出了“先驱者的病毒”，即那种不了解一个时代知识之内在逻辑关系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康吉扬：《科学之历史与哲学研究》，*Etudes d' 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2、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指出了，自上个世纪出现的符号学发现的连接，是怎样从“无－反顾”，即从索绪尔对于语言的全部思考出发（雷尼奥[F. Régnault]，见菲尚和佩舍所著《科学史》）而建立了符号的特性和自立性的。我们也指出过，一方面是叶尔姆斯列夫，另一方面是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格布森是怎样发展和完善索绪尔主义的。我们简单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普洛普“结构主义”的贡献。随后，我们又尽力确定了格雷玛斯重新解释这套理论和使其具体化的方式。在此之后，我们便不得不以在历史写作过程中常见的不合理方式，来大大简化和只突出重点。许多人名只是勉强提到，但他们本该出现在此，特别是布隆达尔，他的符号现象学更将其安排在符号学的未来之中，而不是在其过去。还有比桑，他从内心与索绪尔对立，但有过许多强烈的直觉表现。

3、这样一种介绍的全部内容，并不掩饰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如果人们参阅伊万诺夫（V. V. Ivanov）的《苏联符号学史》（*Essais sur l' Histoire de la sémiotique en URSS*）（1976）来回顾索绪尔有关语言系统的共时观点（人们曾在长时间内将其看作言语活动之历史性的负面）在苏联人的思想中所表现的意识形态障碍的话，就会对这一点理解得更好。伊万诺夫也指出，索绪尔的著述当时在苏联被允许，恰恰不是因为他被看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家，而仅仅被看作是令人不安的变形词的辨

认者。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任何严格地讲是理论上的努力都是被禁止的。相反，一种符号学哲学却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点起了火焰，直至在符号学领域重新得到了（这是对于伊万诺夫的指责）一种与巴赫金（1895—1975）的思想同样彻底地对立于形式主义者的思想。

4、如果说符号学的论题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是“敏感的”，那么，它们在认识论上也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其最新的发展方面。时间的考验将巩固在最近二十年来调动起研究者团体积极性的这些观点，或者将其淘汰，就像它们是虚假的那样。然而，即便历史可能贬低符号学矩阵，即便叙述性图示可能像强加给普洛普的那种改造一样来承受一种彻底的变化，即便对于话语的分析发现了完全异样的关联情况，即便有一天会像在数学上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例如布尔巴基[Bourbaki]关于希腊数学的论述，见《数学的历史成分》[*Elements d'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第160页及以后几页），为了推进符号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会需要临时地付出后退的代价，但是，鉴于格雷玛斯在一生中积极参与的理论争论的重要性和这种争论的地位在提升，符号学还是应该定义为一种“关于意指的理论。它首要关心的将是，以概念建立的形式来阐述意义的获得和产生的条件[……]”（《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推理性辞典》，1979，第345页）。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虽然表面上模糊和空泛，但它们都在概念研究的发展和连续的变化当中得到了意义充实：符号学

理论的真实定义,那就是它的历史。在阐述让·卡瓦耶[①]的时候,难道还必须下结论说他完全可以对于符号学的未来具有建立在符号学基础上的一种客观性吗?

① 让·卡瓦耶(Jean Cavaillès,1903—1944):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以研究数学逻辑著称。——译注

参考书目

阿马凯尔(R. Amacker):

—《索绪尔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saussurienne*),日内瓦,Droz 出版社,1975,第 244 页。

贝特(E. W. Beth):

—《数学存在方式》(*L' existence en mathématiques*),巴黎,Gauthier - Villars 出版社,1956。

—《论述帕多阿有关定义理论的方法》(On Padoa's method in the theory of definition),见《数学导论》(*Indagationes mathematicae*),第 XV 卷,1953,第 330—339 页。

布雷亚尔(M. Bréal):

—《言语活动的潜在观念》(*Les idées latentes du langage*),开讲课程,法兰西公学,1868。

—《论语义学》(*Essai de sémantique*),巴黎,1897。

比桑(E. Buyssens):

—《言语活动与思维——生命与实体》(*Langage et pensée, vie et matière*),安特卫普,1928。

—《言语活动与话语——论符号学框架内的功能语言学》(*Les langages et le discours. Essai de linguistique fonctionnelle dans le cadre de la sémiotique*),1943。

—《传播与语言的联结》(*La communication et l' articulation linguistique*),布鲁塞尔,1967。

《索绪尔手册》(*Cahiers F. de Saussure*),各期,特别是第 12、15、

17 和 21 期。
迪尔凯姆(E. Durkheim):
—《个体再现与集体再现》(Représentations individuelles et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见于《玄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898 年 5 月,第 273—302 页。
埃柯(U. Eco):
—《言语活动的符号学与哲学》(*Sémiotique et philosophie du langage*),巴黎,PUF 出版社,1988,第 285 页。
恩格勒(R. Engler):
—《索绪尔术语学的词汇》(*Lexique de la terminologie saussurienne*),安特卫普,CIPL 出版社,196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批评版专辑,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68—1974)。
戈代(F. Godet):
—《索绪尔——关于言语活动的科学》(*Saussure. Une science du langage*),巴黎,PUF 出版社,1987。
戈布洛(E. Goblot):
—《论科学之分类》(*Essai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s sciences*),巴黎,Alcan 出版社,1898。
戈德尔(R. Godel):
—《〈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日内瓦,Droz 出版社,1969。
格雷玛斯(A. J. Greimas):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L'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见

《现代法语》杂志(*Le Français moderne*),第3期,1956,第191—203页。
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言语活动理论导论》(*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巴黎,Minuit出版社,1971。
《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特刊:《言语活动的心理学》(*La psychologie du langage*),巴黎,Alcan出版社,1933。
《法语》杂志(Langue française),第63期,巴黎,Larousse出版社,1984。
莫罗(Tulio de Mauro):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由巴利(Ch. Bally)、薛施蔼(A. Sechehaye)和里德林格(A. Riedlinger)整理出版,1915,批评版,巴黎,Payot出版社,1982。
纳维尔(A. Naville):
—《科学之新的划分》(Nouvelle classificaton des sciences),巴黎,Alcan出版社,1888。
诺尔芒(C. Normand):
—《关于读解索绪尔的建议与评注》(Propositions et notes en vue d'une lecture de F. de Saussure),见《思维》杂志(*Pensée*),第154期,1970年12月,第34—51页。
帕里安特(J. -C. Pariente):
—《言语活动与个体》(*Le langage et l'individuel*),巴黎,Colin出版社,1973。
佩舍(M. Pêcheux):
—《话语的自动分析》(*Analyse automatique du discours*),巴

黎，Dunod 出版社，1969。

赖斯（T. Reiss）：

—《符号学及其不满者：索绪尔与格雷玛斯》（Semiology and its discontents：Saussure et Greimas），见《分析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y of analysi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科学论文集》（*Recueil de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日内瓦，1972。

—《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参阅莫罗与恩格勒的著述）。

齐尔贝尔贝格（C. Zilberberg）：

—《返回索绪尔吗？》（*Retour à Saussure?*），《GRSL 资料》，VII，63，1985。

—《意义的理性与诗性》（*Raison et poétique du sens*），巴黎，PUF 出版社，1988。

关于叶尔姆斯列夫

布隆达尔（V. Bröndal）的研究工作：

—《普通语言学论集》（*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哥本哈根，1943。

叶尔姆斯列夫的研究工作：

—《语言学论集》（*Essais linguistiques*），巴黎，Minuit 出版社，1971。

—《言语活动》（*Le langage*），巴黎，Minuit 出版社，1966。

—《言语活动理论导论》(*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巴黎,*Minuit* 出版社,*1971*。
—《新论文集》(*Nouveaux Essais*),巴黎,PUF 出版社,1985。

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研究

对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研究:

安贝托·埃柯(Umberto Eco):
—《符号》(*Le signe*),1988。
埃尔曼·帕雷(Herman Parret):
—《语用学与符号学》(*Pragmatique et sémiotique*),1983。
齐尔贝尔贝格(CL. Zilberberg):
—《意义的理性与诗性》(*Raison et poétique du sens*),巴黎,PUF 出版社,1989。

杂志特刊:

《言语活动》(*Langage*) N°6:*La Glossématique*
-86:*Actualité de Bröndal*, Juin 1987
《博学者》(*Il Protagora*), *L. Hjelmslev*, *Linguistica*, *sémiotica*, *epistemologia*, anno XXV, 7—8, 1985
《诗》(*Versus*), 43, 1986。

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

普洛普(Vladimir Propp):

—《故事形态学》(*Morfologia della fiaba*)(*Con un intervento di Claude Lévi – Strauss e una replica dell' autore*),都灵,Einaudi 出版社,1966。

—《故事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巴黎,Seuil 出版社,1970。

—《传奇故事的历史起源》(*Racines historiques du conte merveilleux*),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83。

贝迪耶(J. Bédier):

—《韵文故事》(*Les fabliaux*),巴黎,1894。

邦维尼斯特(E. Benvéniste):

—《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I et II,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7。

布雷蒙(C. Brémond):

—《叙事文逻辑》(*Logique du récit*),巴黎,Seuil 出版社,1973。

布朗登(Th. Broden):

—《美国符号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3/4 出版社,1991。

巴德尼亚基维齐(Th. Budniakiewicz):

—《逻辑故事的基础》(待出版)(*Fundamentals of story logic*)(à paraître)。

比桑(E. Buyssens):

—《索绪尔共时语言学》(*La 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 de Saussure*),见《索绪尔手册》(*Cahiers F de Saussure*),18,1961。

卡西尔(E. Cassirer):

—《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in modren linguistics*),《言辞:纽约语言学团体杂志》(*Word*),1945。

《交换》杂志(*Change*),N°3,1969;N°10,1972,巴黎,Seghers - Laffont 出版社。

库尔泰(J. Courtès):

—《列维 - 斯特劳斯与神话思维的局限性》(*Lévis - Strauss et les contraintes de la pensée mythique*),Mame 出版社,1973。

—《民间故事——诗学与神话》(*Le conte populaire. Poétique et mythologie*),巴黎,PUF 出版社,1986。

科尼奥(G. Conio):

—《俄国形式主义和未来主义面对马克思主义》(*Le formalisme et le futurisme russes devant le marxisme*),洛桑,l' Age d' homme 出版社,1975。

埃利克(V. Erlich):

—《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见《历史与学说》(*History - doctrine*),耶鲁,1954。

加代(F. Gadet),佩舍(M. Pêcheux):

—《找不到的语言》(*La langue introuvable*)(I,16),巴黎,Maspero 出版社,1981。

保罗·加尔文(Paul Garvin):

—《布拉格流派——美学文学结构与风格》(*A Prague school study on esthetics, lit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华盛顿,1958。

格雷玛斯(A. J. Greimas):

—《俄国民间故事，功能分析》(Le conte populaire russe, analyse fonct'onnelle)，见《国际斯拉夫语言学与诗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étics*)，IX，海牙，Mouton 出版社，1965

雅格布森(R. Jakobson)：

—《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见《普通语言学论集》(*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假设》(*Hypothèses*)，Paris，Seghers – Laffont 出版社，Coll. "Change"，1972。

—《诗学问题》(*Questions de poétique*)，巴黎，Seuil 出版社，1975。

杰斯珀森(O. Jespersen)：

—《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伦敦，1924。

拉里瓦依(P. Larivaille)：

—《叙事文的形态分析》(L' analyse morphologique du récit)，见《诗学》杂志(*Poétique*)，1974。

列维 – 斯特劳斯(C. Lévi – Strauss)：

—《与夏博尼埃的谈话》(*Entretiens avec G. Charbonnier*)。

—《结构与形式》(La structure et la forme)，见《结构人类学》(之二)(*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II*)，巴黎，Plon 出版社，1973。

帕森、塔尔科特、爱德华·希利(Parsons, Talcott et Edward Shils)：

—《行动的总体理论》(*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哈佛，1951。

《诗学》杂志(*Poétique*)：N°3，1970；N°7，巴黎，Seuil 出版社，

1971。
罗班(R. Robin):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不可能的美学》(*Le réalisme socialiste: une esthétique impossible*),Payot 出版社,1986。
塔尔德(G. Tarde):
—《社会逻辑》(*La logique sociale*),巴黎,1898。
泰尼埃(L. Tesnière):
—《结构句法的组成成分》(*E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巴黎,Klincksieck 出版社。
托多罗夫(T. Todorov):
—《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巴黎,Seuil 出版社,1965。
特鲁别茨柯依(N. S. Troubetzkoï):
—《当前的音位学》(La phonologie actuelle),见《言语活动心理学》一文(Psychologie du langage),见《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30,1933。
—《音位学原理》(*Principes de phonologie*),法文译本 J. Cantineau,巴黎,1949。
齐尔贝尔贝格(C. Zilberberg):
—《意义的理性与诗学》(*Raison et poétique du sens*),巴黎,PUF 出版社,第 19—39 页。

关于巴黎学派

格雷玛斯的著述:

格雷玛斯：

—1965,《俄国民间故事,功能分析》(Le conte populaire russe, analyse fonctionnelle),见《国际斯拉夫语言学与诗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and Poetics*),9,第152—175页。

—1966,《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Larousse出版社,而后从1986年起改为PUF出版社。

—1970,《论意义》(*Du sens*),Seuil出版社。

—1976,《符号学与社会科学》(*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Seuil出版社。

—1976,《莫伯桑——文本符号学》(*Maupassant. La sémiotique du texte. Exercices pratiques*),Seuil出版社。

—1979,《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推理性辞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Hachette Université出版社(与库尔泰合作)。

—1979,《社会科学话语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à l' analyse du discours en sciences sociales*),Hachette Université出版社。

—1983,《论意义》(之二)(*Du sens II*),Seuil出版社。

—1986,《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推理性辞典》(之二)(*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2,A. J. 格雷玛斯与J. 库尔泰,Hachette Université出版社。

—1987,《论不完美性》(*De l' imperfection*),P. Fanlac出版社。

—1991,《激情符号学——从事物状态到心灵状态》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Des états de choses aux états d'âme*),Seuil 出版社,与丰塔尼耶(J. Fontanille)合作。

主要对话人:

巴特(R. Barthes):到处。
布朗谢(R. Blanché):
—《智力结构——论概念的系统组织》(*Structures intellectuelles. Essai sur l'organisation systématique des concepts*),1966。
布隆达尔(V. Bröndal):到处。
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到处。
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
—《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I et II。
—《神话》(*Mythologiques*),Plon 出版社。
梅洛-蓬蒂(M. Merleau-Ponty):到处。
普洛普(V. Propp):
—《故事形态学》(*Morphologie du conte populaire*)。
赖兴巴赫(H. Reichenbach):
—《科学哲学》(*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Hermann 出版社,1932。
—《数理逻辑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logistique*),1939。
索绪尔(F. de Saussure):到处。

采访录、导论、专题著述:

《符号学学报》(公报与资料)(*Actes sémiotiques*)[*Bulletin et Documents*]:到处。

科凯(J. -C. Coquet):

—《话语与其主题》(*Le discours et son sujet*),1984—1985。

库尔泰(J. Courtès):

—《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思维的局限性》(*Lévi-Strauss et les contraintes de la pensée mythique*),巴黎,Mame 出版社,1973。

—《叙述与话语符号学》(*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discursive*),Hachette Université 出版社,1976。

—《民间故事:诗性与神秘性》(*Le conte populaire:poétique et mythologie*)PUF 出版社,1984。

丰塔尼耶(J. Fontanille):

—《平分的知识:马塞·普鲁斯特具备的知识之符号学与理论》(*Le savoir partagé:sémiotique et 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 chez Marcel Proust*),Hadès 出版社,1987。

安特卫普研究小组(Groupe d'Entrevernes):

—《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导论:实用性理论》(*Analyse sémiotique des textes. Introduction:théorie pratique*),PUF 出版社,1979。

埃诺(A. Hénault):

—《符号学赌注》(*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PUF 出版社,1979

—《叙述学:普通符号学——符号学赌注(之二)》(*Narratologie,sémiotique générale*,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 2),PUF 出版社,1983。

朗多夫斯基(E. Landowski):

—《被思考的社会——论社会符号学》(*La société réfléchie. Essai de socio-sémiotique*),Seuil 出版社,1989。

内夫(F. Nef):

—《意指的基本结构》(*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signification*),Complexe/PUF 出版社,1976。

帕雷(H. Parret):

—《论语言》(*Discussing language*),Mouton 出版社,1974。

拉斯捷(F. Rastier):

—《论话语符号学》(*Essais de sémiotique discursive*),Mame 出版社,1973。

—《解释语义学》(*Sémantique interprétative*),PUF 出版社,1987。

—《语义学与认知研究》(*Sémantique et recherches cognitives*),PUF 出版社,1991。

里科(P. Ricoeur):

—《格雷玛斯的叙述语法》(La grammaire narrative de Greimas),见《符号学学报》(*Actes sémiotiques*),II,15,1980。

资料研究:

布德尼亚基维齐(Th. Budniakiewicz):

—《叙述符号学概念》(Conceptual Survey of Narrative Semiotics),*Disposition*,III,7—8,1978。

《法语》杂志(*Langue française*):

—《建立语言学的社会史》专辑(*Vers un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linguistique),N°63,1984。

奥鲁(S. Auroux),舒勒(J. –C. Choul):

—《语言学史材料》(*Matériaux pour une histoire des théories linguistiques*),PUF 出版社,1984。

《符号学要求与展望》(祝贺格雷玛斯论文汇编)(*Exigences et perspectives de la sémiotique*)(Recueil d'hommages pour A. J. Greimas),Benjamins 出版社,1985。